

意象、想像、理想交織的戰圖： 《平定臺灣得勝圖》的製作、重繪、 贈送與目的^{*}

盧正恆^{**}

提 要

《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為福康安（1754-1796）聘僱畫工在臺灣製作、北京裝裱並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呈交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之圖冊。經過一系列的調整，最終確定選圖、題詩、增繪；此過程已有學者詳實闡述。本文將焦點移往各階段圖繪主導者，包括福康安、清宮以及最後皇帝對此圖利用的三階段。首先關注福康安在完成交辦任務之餘，嘗試在圖中展現自身功績，用以回應皇帝寄予的厚望。隨著此圖在清宮畫家和皇帝意志下轉繪為彩圖、銅版畫，福康安的個人色彩被逐一抹去，並依照過往戰圖繪畫經驗、技法添加了對於臺灣戰場的想像。最後，考證乾隆皇帝視此戰為發生於內地之外的海疆，配合當時滿洲族群認同建構，強調尚武的滿洲在海疆締造之偉業，並將之刻意宣傳於內亞。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團前來時，更特別選此為禮品贈與。通過分析從《進呈副本》到彩繪本、銅版畫、贈送的過程，理解清代戰圖在層層轉換中，隨著各階段主導人的意志而展現不同的目的和結果。

關鍵詞：福康安、清宮、得勝圖、馬嘎爾尼、帝國建構、臺灣

* 收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1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 年 5 月 3 日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清代旗人群體的海疆認識與帝國建構」（110-2410-H-A49-034-MY3）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意見使本文更加完善。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16幅《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以下簡稱《進呈副本》）現藏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學者已藉由比較該圖冊與流傳較廣的12幅《平定臺灣得勝圖》間的差異，論述《進呈副本》施畫者是以臺灣城市觀點，參考相關文本、圖像、方志，添入對於邊區的想像，可被視為是在地施畫者將真相（戰場）轉變為印象（攫取重點和多日戰鬥濃縮）之展現。¹然而，除在臺施畫者外，此轉製過程亦涉及福康安、位於帝都重新繪畫與製作銅版的宮廷畫家、及乾隆皇帝之想法和目的。本文擬以《進呈副本》與《平定臺灣得勝圖》（含彩繪本與銅版畫）為主要史料，配合滿、漢文資料，以李泰翰、詹鎮鵬、盧正恒等先行研究為基礎，²進而聚焦福康安、清宮、乾隆皇帝三方，理解此圖冊之生命史。本文將闡述福康安於《進呈副本》中強調在臺戰功之意象；清宮重製為彩繪本、銅版畫時，由於對臺灣與戰場狀況不熟稔，某種程度仰賴過往畫繪經驗添加想像成分；最終，皇帝利用此圖冊體現「滿洲之道」在海疆締造之勝果，此帝國偉業不僅首先被特別宣揚於內亞區域，並臨時刻意選為贈予馬嘎爾尼使團的禮品，具有警告、宣揚之理想企圖。查考此轉換過程，本文試圖論述了原繪於臺灣在經過清宮修正的嶄新風貌，與之在帝國建構上的運用。

關於《得勝圖》的討論充裕，其中馬雅貞的研究頗具代表性，指出乾隆皇帝的銅版畫具有強調帝國武功、滿洲尚武文化之用。³在《進呈副本》問世前，因缺乏最接近戰事發生時期所繪製的底本，致使多數研究乃基於最終製品（例如彩繪本或銅版畫）為主軸進行探索，但無損馬雅貞對此領域的卓越貢獻。但若將《進呈副本》納入討論框架後，將可更細緻地追索不同階段主導者對成品之影響進行理解。分析主導者對圖繪之影響，馬雅貞有關《太平歡樂圖》的研究也有相似脈

1 相關細節可參見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臺灣史研究》，28卷4期（2021.12），頁41-120。

2 關於《平定臺灣得勝圖》的研究，當推李泰翰與詹鎮鵬。李泰翰詳實且鉅細靡遺地考證該圖冊的繪製過程，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25卷2期（2007冬），頁139-178；詹鎮鵬則完善了該圖在分送邊疆後如何被重製成為雕漆掛屏並且反向輸回宮中，參見詹鎮鵬，〈帝國紀勳與地方貢品：乾隆朝《平定臺灣得勝圖》雕漆掛屏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5期（2018.9），頁189-243。

3 此論點是馬雅貞的核心觀點，可參見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絡，探索該圖進獻者金德輿（1750-1800）個人、交友圈、地方社會以及帝國中心、邊陲的政治框架之複雜關係。呈現民間樣態的風俗畫，在製作、進獻起訖中亦展現地方樣貌與人脈網絡特色。⁴ 更深一層地談論圖繪從底本到終稿，《盛世滋生圖》的產生無疑可充作絕佳案例，從畫師徐揚（1712-1779?）介於本地、宮廷間的立場，顯露揚州人對地方特色的描述、承繼、改造，並配合乾隆皇帝政治企圖，揭示畫師、皇帝，論述中央和地方關於一幅圖繪製作的互動。⁵ 意即參照上述各種討論後，《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到《平定臺灣得勝圖》的過程不僅可補充過往《得勝圖》研究中缺失的一塊，也可與諸如《太平歡樂圖》和《盛世滋生圖》分析脈絡有雷同之處：從中理解地方、主導者、帝都在不同階段對於圖像畫製所反映的情形。

《進呈副本》的發現，使《平定臺灣得勝圖》的研究將得以從初稿為始，編輯過程、彩圖版及銅版畫的誕生、甚至最終皇帝的贈送可被逐一釐清闡明，這或可使《得勝圖》研究更加完整。因此，本文嘗試集中於《進呈副本》到《平定臺灣得勝圖》的繪製過程，挖掘各階段主導者，包括福康安、宮廷畫師、西洋畫師、乾隆皇帝等所透露的觀點、目的、利用。期盼藉由本文之討論充實現時《得勝圖》與清代武功文化、邊疆戰事想像、帝國建構等面向，還原此圖完整的生命史。

二、福康安軍功渴求與個人功勳

盧正恒已針對《進呈副本》繪製有過討論，若欲繼續剖析《進呈副本》繪製的意義，除了通過施畫者本身，也該藉由馬雅貞對明代戰爭圖像研究為基礎參考，更仔細地審視該圖冊。明代紀念文官的戰勳圖除作戰情景外，將政績和官員個人結合亦是重要因子，且此視覺文化到清初仍蔚為主流。⁶ 不過馬雅貞指出與戰爭相關文藝論述、圖像「都以個人事蹟為中心，尤其是環繞在特定官員的勳功，與清代乾隆（1765-1795）以後多以交戰對象如〈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來表述的

4 馬雅貞，〈風俗、地方與帝國：《太平歡樂圖》的製作及其對熙皞之象的呈現〉，《中央大學人文學報》，45期（2011.1），頁141-194。

5 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期（2008.3），頁259-322。

6 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期（2011.12），頁60、84。

方式很不同」。⁷ 此結論來自其分析基準是宮廷製作彩圖版本，或已刊刻成銅版畫版本。由於福康安的《進呈副本》是當前唯一發現繪於戰事甫結束或即將結束、於邊疆的稿本，此版本是否展示相同的交戰對象為主的尚武文化或帝國武功呢？本節闡述福康安主導之《進呈副本》是將個人戰爭圖暗藏在皇帝指派的任務中。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福康安奉命在臺聘僱畫工繪製與林爽文交戰的八場重要戰役；此八幅圖於七月十四日呈予乾隆皇帝；八月四日又上呈未獲指示、額外增繪的八幅圖繪；八月十七日，乾隆將圖冊收儲宮中成為《進呈副本》；九月二十日從 16 幅圖中揀選 10 幅圖畫製彩圖作為日後銅版畫之基礎。⁸ 做為畫作而非現代攝影技術，此圖冊並非將福康安的經歷和觀察之畫面真實還原。此圖冊是僱用的畫工所製，但負責主導的福康安，自然在選題、構圖、描繪等取捨過程中，理所當然地扮演著重要角色，並渴望呈現給潛在的唯一「讀者」——乾隆皇帝——特定意象。⁹

福康安，富察氏，滿洲鑲黃旗。其家族自努爾哈赤時期就已鞍前馬後。哈什屯（1597-1663）歷任內務府總管等職，其子米思翰（1633-1675）歷任尚書，隨後諸如李榮保（1674-1723）、馬齊（1652-1739）等人亦任高官。¹⁰ 根據富察氏的滿文佐領冊，此家族擁有許多佐領，李榮保雖曾承襲其中一份佐領，但其子一脈並未承繼任何富察家族的其餘佐領。¹¹ 李榮保之女嫁給尚未即位的弘曆，並在其登基後成為大清皇后（即孝賢皇后（1712-1748））。¹² 孝賢皇后的族人多是朝廷棟樑，其弟傅恒（福康安之父）官至大學士，加上金川、緬甸戰役的勝利，更受封忠勇公。黃一農考證傅恒（1722-1770）、福隆安（1746-1784）、福長安（1760-1817）、福康安等人之任官歷程，在民初野史傳聞的基礎上，論證福康安除了「生封貝

7 馬稚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頁 53。

8 參見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頁 139-178；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45-48。

9 林加豐用三幅地圖闡述福康安入山戰役之狀況，其中一幅為隨著奏摺所進呈的圖繪、地圖等，展現兵力部署、安排等過程，可以補足文獻上之不足。《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有類似的功用，都是展現其軍功和領導能力。可參見林加豐，〈圖史互證：院藏〈清軍圍捕林爽文圖〉與福康安剿捕林爽文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3 期（2009 春），頁 105-132。

10 參見黃一農，〈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秘〉，《漢學研究》，31 卷 1 期（2013.3），頁 125。

11 過去似乎未有學者分析過該檔案，該份佐領冊說明整個家族的佐領繼承緣由，可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譜牒檔案》，B 字檔，第 39 捲，世襲 50 冊。

12 參見黃一農，〈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秘〉，頁 128-139。

子、死封郡王」外，在任官上並未超越其父或兄任官初期之歷程。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起，皇帝就期待他在武事領域上能有所發展，但即便福康安於乾隆五十二、五十三年（1787、1788）擊潰林爽文叛變，似乎也並未達成乾隆皇帝期許的戰勳；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爾克戰役，才真正的締造皇帝認知中的不世之功。¹³

福康安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擔任侍衛伴隨皇帝左右，三十六年（1771）任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戶部侍郎等職，隔年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進入軍機處行走。¹⁴三十七年（1772），福康安作為領隊大臣前往戰事如火如荼的大小金川；隨即留下參戰直到四十一年（1776），在金川三年期間，福康安均在前線作戰，但也僅是諸多將領中的一員。¹⁵當然最終還是成為此戰役的功臣之一，名列五十名功臣繪像紫光閣，但位列在同族的明亮（1736-1822）、福隆安、奎林（?-1792），甚至是日後多充當其副手的海蘭察（1740-1793）之後。¹⁶四十二到四十五年（1777-1780），福康安陸續擔任吉林將軍、盛京將軍等。¹⁷四十五年（1780），福康安被任命為雲貴總督處理銅礦事務，也負責四川囑匪之事。旋即成為四川總督兼成都將軍，看似措辦囑匪，實則在抵達四川前，囑匪引發的混亂已大致平定，福康安僅負責後續處理與審訊。¹⁸四十九年（1784），福康安又以欽差大臣之名前往廣東，

13 黃一農，〈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密〉，頁 147。

14（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891，頁 945b，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戊子；卷 907，頁 139a，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丁亥；卷 908，頁 158b，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壬寅。

15（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2，頁 378b-380b，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癸酉；卷 938，頁 647b，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初八日乙丑；卷 1000，頁 386a-387b，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己卯。相關內容也可參見陳潘、葉小琴，〈沙濟富察氏與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5 卷 2 期（2016.4），頁 9。

16（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00，頁 388b-389b，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庚辰。

17 值得一提的是，福康安於乾隆四十二年奉命捕授吉林將軍時，前任吉林將軍富椿被調任杭州將軍的理由之一在於他管轄的區域屬於滿洲龍興之地，但是當地人群已失滿洲舊俗，甚至推薦的驍騎校人員不通清語，因此福康安到此的任務之一就是「俾令加意整頓彼處習氣」。下文還會提到，福康安同時被乾隆皇帝指責清文不甚流暢。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35，頁 868a-868b，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乙卯；卷 1071，頁 374b-375a，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丑。

18（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03，頁 762b-763a，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丁酉；卷 1104，頁 782a-782b，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壬戌；卷 1137，頁 211a-212a，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卷 1138，頁 227b-228a，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丙子；卷 1138，頁 232a-233b，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壬午。

同年兼任兵部尚書、內務府大臣等職。¹⁹後因石峰堡等處回民叛亂，福康安改任陝甘總督。²⁰並在隨後擊敗叛軍、擒獲叛首，但此戰主要指揮官仍是阿桂（1717-1797）。²¹確實，福康安在參加廓爾喀等地戰役前，已是乾隆皇帝麾下最成功的軍事指揮官之一；且林爽文事件前，福康安已是歷練於西南、西北、東北、廣東等地、極具邊疆經驗的封疆大吏。但他經歷的戰事中，僅有第二次金川之戰屬於規模較大的戰爭；在雲南、四川等均屬小規模亂事，甚至未領兵作戰。就連僅是叛變性質的甘肅戰役中，真正的指揮官是阿桂而非福康安。相較於其父曾主導第一次金川戰爭、緬甸之戰等，福康安或期許能盡快開啓他自己的軍功事業。換言之，林爽文的戰事是他首次主導一場戰爭，因此趁編繪《進呈副本》的機會，將自己功勳展現於乾隆皇帝眼前將是至關重要的目標。

乾隆五十一年（1786）底林爽文起事，初期乾隆皇帝堅信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1722-1789）可妥善地處理此事。²²但隨著戰事愈趨膠著，乾隆皇帝決定將戰事交予常青（1713-1793）等。然而常青等亦無法達成皇帝之盼望，乾隆皇帝因而物色新人選前往臺灣；首選原該是阿桂，但因年事已高，加上已確定派往的將領包括海蘭察（?-1793）和李侍堯（?-1788）等，乾隆皇帝認為惟有福康安得以駕馭壓制二人，因此命其前往避暑山莊會面、商討戰事；該年八月，乾隆皇帝決議派福康安前往臺灣主導戰事。²³

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到皇帝賞的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隔日寫下恭謝天恩奏摺，稱：「奴才年甫韶龔已承恩眷，稍長即在內廷行走，蒙恩

19（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194，頁967a，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丙寅；卷1202，頁74b，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初三日戊午。

20（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07，頁153b，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壬申；頁165a，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庚辰。

21（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09，頁207a-210b，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己酉；頁212a-214a，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壬子；卷1210，頁225b-230b，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一日甲子。

22 例如乾隆五十一年皇帝稱「上年臺灣即有漳泉兩處匪徒械鬥滋擾等案，一經黃仕簡帶兵前往督辦，立即撲滅。今林爽文等結黨橫行，情事相等，該提督到彼，匪黨自必望風潰散。」這一段文字正是相信黃仕簡能力的最佳佐證，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71，頁1144b-1145a，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戊辰。

23（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65，頁1044b，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戊子；卷1283，頁193a-193b，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丙辰；卷1286，頁240b-241a，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戊戌。

教誨拔擢以至成人」，並宣稱截至當前為止兩件主要軍事功績「從前平定金川」和「石峯堡之役」，不過也承認「與阿桂會同進剿」。隨後開始鉅細靡遺地闡述他是如何從鹿港登陸，隨後拯救諸羅縣城，擊敗敵軍俘虜林爽文，並強調「皇上廟算精詳天威赫濯，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等身先士卒，無不以一當千」，這一句話無疑是戳中皇帝心中最期待的滿洲軍隊奮勇向前的心願。此戰役「奴才居中調度」，他自然明白為何自己會有如此殊榮厚寵，因為「奴才兄弟叔姪又復一門榮顯」，更自謙「此次臺灣逆匪祇係內地奸民，本非平定西陲及金川可比，況從前奴才父傅恒已叨章服之榮」。這些文字不僅僅告訴了皇帝他過去的功勳並非自身締造，就連此次戰功也是受到皇帝指示，不過他領導的軍隊勇往直前也是不容忽視，其家世背景也讓他此次戰役不容有失；皇帝則批下「不必辭。若生獲林爽文，自然承受不得此恩。今既生獲有何可說」。²⁴

除了福康安本人急切的心態外，還有另一人也抱持相同想法，即是此圖的讀者乾隆皇帝。福康安自幼在宮中學習成長，加上孝賢皇后的緣故，乾隆皇帝無疑對著其有著極高的期許。²⁵ 戰爭期間，皇帝曾提到：「福康安由垂髫養，經朕多年訓誨，至於成人；今甫經委任畀以軍旅重寄；即現在勦捕賊匪，攻克賊巢，皆朕指授方略，再三訓示，將士等踴躍用命，始能所向克捷。今甫經解圍得勝，朕即優加獎賞，福康安自當倍加感奮，迅速擒拏賊首，剋日蕝功，以期承受恩眷」。²⁶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六日，雖然臺灣戰事已暫告一段落，乾隆皇帝曾無奈地表示本預期福康安可更早結束戰爭，但局面如此只好妥協於接受如此拖沓的現況；並叮囑福康安盡快完成任務，勿辜負殊恩。²⁷ 戰後，乾隆皇帝一首詩詞更闡明其想法；皇帝對傅恒之子、孝賢皇后之姪福康安寄予厚望，倘若此次臺灣之戰無法成功，必定重重治罪——幸好最終成功。²⁸ 據上述所言，乾隆皇帝希冀通過這次戰爭協助鋪陳、助其一臂之力。正因如此，得以使皇帝隨後驕傲地讚譽之，例如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輯 66，頁 821。

25 此期待很大程度來自於皇帝和孝賢皇后之間的關係，參見黃一農，〈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密〉，頁 140-141、146。

2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卷 51，頁 818。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1），冊 20，頁 464。

28（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文十全集》，收入《百部叢書集成·二十七·聚珍版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第 82-83 函，卷 37，詩 31 首，頁 9b-10a。

乾隆五十四年（1789）一月，福康安前旨前往鎮南關接辦事務時，皇帝稱其：「久歷戎行，又甫經平定臺灣賊匪，聲威已著。」此描述無疑把軍功、尙武、臺灣三件事結合在一起。²⁹

乾隆皇帝和福康安的關係與期許作為派往戰場的前奏，福康安本人又是如何看待這次機會？戰事期間，福康安在戰場上看似勢如破竹，但同時也面臨鬥爭的內部問題，例如深受皇帝信賴、聲望甚高的柴大紀（1732-1788），就與滿洲將領不合因而被彈劾；然而當福康安批評柴大紀時，甚至一度被乾隆皇帝指責雙重標準等。³⁰意即，福康安雖有皇帝信賴，倒也不見得是一帆風順。或許正因如此，雖然福康安已透過奏摺積極顯示他在戰爭中決斷敗敵的一面，但戰圖稿本繪製更能展現他個人功績並回應皇帝期許。

《進呈副本》或可被歸類為典型的複合型戰爭圖，強調戰鬥、勝利與功績。³¹因此福康安如何在畫作中的諸戰役中策略、戰術、領導等方面獨到之處呢？《進呈副本》的上呈可分成兩階段，除了乾隆皇帝最初欽定的八幅外，福康安實際上另外提供八幅圖。扣除皇帝要求繪製的戰役外，福康安自作主張進呈包括興化店、大排竹、獅子頭社、大里杙、小半天、大武壠、牛庄、枋寮等圖，其中被皇帝挑選進入最終版本的有大里杙、小半天、大武壠、枋寮等四幅。若將福康安額外進獻八幅畫作分類，可發現這些圖共享某些特色：略分為較大規模的戰役或橫跨複雜地形後的勝利，圖內又可再細分為是否於戰場上擄獲或斬殺敵軍首領（圖1）。《進呈副本》與福康安在戰時奏摺可相互呼應，例如兵分數路、接納民番投誠、開挖水渠等。

在皇帝尚未進一步指示之前，福康安此舉莫不會有多此一舉揣摩上意之嫌嗎？抑或是，福康安另有目的才甘願如此？實則，這八場戰役與「福康安」本人

29 作為比較，皇帝特別強調「前任兩廣孫總督本屬文臣，未嫻軍旅，是以帶兵出關，不察虛實，誤聽爾處人言」。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22，頁882b-884a，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庚寅。

30 李天鳴，〈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秋），頁183-184；許雪姬，〈由乾隆肅貪看柴大紀案〉，《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秋），頁211-215。

31 邢義田的論述指出交戰圖必須展現出人物（服裝、面貌展現胡漢差異），畫面布局要有對壘（武器傷亡和衝鋒）等，藉此表達這是一場真正的戰鬥。獻俘圖則是有若干人下跪或站立，也可能展示被斬殺的首級俘虜等，至少要有面對這些俘擄或是屍體的官員，才能變成所謂的「獻俘圖」。蘊含交戰圖和獻俘圖可能成為所謂的複合型圖。參見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的構成、類型與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期（2005.9），頁69、82-84。

關聯性似乎甚高；如此一來，值得探索的問題就是這十六場戰爭所展現的是「清軍」或「福康安」的功勞呢？實際上，無論在林爽文抵臺前或後，不少關鍵戰役或擊殺敵軍甚多、又或屬於戰役轉折，只是與福康安毫無關係，例如普吉保等人於五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收復笨港之戰；³²十月初四到初十日，遊擊李隆（生卒年不詳）並與義民開通道路、斷流構築供大軍前進的平地，隨後柴大紀等率侍衛等擊退林爽文部固守諸羅城，³³即使當福康安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經過波折終於從崇武啓程前往臺灣，並於隔日抵達鹿港，³⁴例如普爾普（?-1790）在大排竹戰後從茅港尾一路到三坎店獲得勝利、舒亮（?-1798）也在大肚獲勝；³⁵十二月二十二日當福康安率軍在水沙連山口時，舒亮在大肚溪營盤擊敗來犯敵軍，隨後札拉芬（生卒年不詳）等人擊殺四百餘名叛軍。³⁶駐守府城的常青（1713-1793）派丁朝雄（?-1794）收復東港；³⁷甚至有關獅子頭社的戰役，《進呈副本》繪製的也是此後原住民獻賊黨首級，而不是描述此前海蘭察率領清軍擊殺兩千餘名林爽文部眾的戰爭。³⁸楓港到柴城之戰中，海蘭察等擊殺三百餘人，但《進呈副本》中所描述的也是隨後「臣福康安照料督催，令各隊層層圍逼」之戰果。³⁹由此可知，除乾隆皇帝欽定戰爭外，福康安主動上呈圖像所代表的戰役並非完全是關鍵的戰爭，其中甚至有如水沙連、攸武乃、水裡社擒獲犯屬、抓拿林爽文等，清軍並未參加或未有作戰行爲；但共同點是福康安均親自參與。因此，這 16 幅圖畫明顯是強調他本人於此次戰役的努力、功績和勇武。

雖然不能將《進呈副本》與個人功勳圖畫上等號，但《進呈副本》無疑透露極爲顯著的性質。尤其，在觀察每一幅圖繪中，都僅有一面龍圖騰的黃旗——這點與之後的銅版畫或彩圖有多幅旗幟不相同，不僅成爲構圖中顯眼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緊隨其後則是一位身穿藍衫、騎著駿馬、臉色白皙的蓄鬍將軍，這位將

3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647。

3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4，頁 702-703。

3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5，頁 715、720、723。

3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7，頁 756。

3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9，頁 787-788。

3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51，頁 824。

3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53，頁 847。

3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55，頁 881-882。

領很可能即代表福康安本人⁴⁰（圖2）。⁴¹

翻閱《進呈副本》每一幅畫作會發現其中義民、綠營、滿洲軍隊數量多數保持平衡，這樣多元兵種的指揮也可以凸顯在福康安所書寫的奏摺中。例如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福康安稱：「臣等現派官兵各處搜莊，不使賊匪潛行誘聚，一俟將村莊搜盡，探明各路賊匪情形，酌派官兵、義民往通諸羅至郡城大路，即行相度機宜，進搗賊巢，跟蹤追捕」，又稱：「臣福康安督催各隊官兵」。⁴²更清楚的例子則是該月十五日奏摺，福康安自稱：「臣等將所帶兵分為三隊，海蘭察、普爾普帶領巴圖魯侍衛在前，恆瑞、鄂輝帶兵及義民首黃奠邦等在旁協勦，臣福康安帶巴圖魯及屯練降番居中調度」。⁴³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可知曉福康安企圖展現的是他統領、整合不同族群部隊的之軍事能力。

總而言之，福康安額外進呈八幅圖，美其名是給予皇帝更多選擇，實則蘊含福康安所背負的親族壓力和急於表現的事實。作為孝賢皇帝的姪子且自幼長於宮中，其父是戰功彪炳的大學士傅恆，即便年僅三十四歲已是歷練於帝國各處邊疆的封疆大吏，但是他的履歷上仍欠缺一筆主導戰爭的紀錄——這樣的紀錄對於乾隆時期的一位滿洲勳裔更顯重要。臨行前，皇帝的叮嚀與囑咐想必言猶在耳，當福康安擊潰叛軍並收到繪圖任務後，他如何在完成交辦事項之餘，同時展現將他個人英姿與功勳活靈活現地呈現在此圖冊最重要的讀者乾隆皇帝眼前，將是他個人的重要使命。

三、清宮想像的「邊疆」和「戰爭」

《進呈副本》在皇帝題詩、揀選後，下一步就是交由皇帝指示、批准後，宮廷畫家開始彩繪圖、銅版畫製作。雖然宮廷「畫院運作機制」過程中，畫家工匠仍

40 此外，每一幅畫作中，共同出現在福康安身後，另有一位身著粉衫的騎馬蓄鬚的旗人，此人或許有可能是隨福康安征戰各場戰役的海蘭察，只是目前仍缺乏更多證據進行證明。

41 此圖為筆者整理，編號1到16的順序依照原《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之排序，不過原圖標籤粘貼錯誤，因此依據戰役內容分別是1.嘉義縣解圍；2.興化店戰役；3.大排竹戰役；4.大埔林、中林、大埔尾戰役；5.水沙連戰役；6.獅子頭社戰役；7.大里杙戰役；8.集集埔戰役；9.小半天戰役；10.擒獲林爽文家屬；11.攻佔斗六門；12.擒獲林爽文；13.大武壠戰役；14.牛庄戰役；15.枋寮戰役；16.瑯嶠戰役、擒獲莊大田。

4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47，頁752-753。

4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47，頁759。

扮演主導和務實創作角色，帝王並非具有完全掌控權。⁴⁴ 但是以《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百駿圖》為例，就是多名畫家協調出相互掌握的合作宮廷畫風，並在建構出共識的合筆之餘，達成符合上意的內容。⁴⁵ 據此來理解《進呈副本》於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起被交予宮廷畫師繪製成《得勝圖》的彩圖版本和銅版畫始末中，清宮內包括宮廷畫師、西洋畫師、皇帝三者，針對從《進呈副本》經宮廷畫家之手修改後轉為彩圖、銅版畫為本節之關鍵。根據現有線索，難以將參與此過程中每位畫家的心態、任務、協調過程進行細緻分析，因此本節將這些修正視為清宮內部協調後之結果，嘗試比較《進呈副本》和彩繪本、銅版畫，從差異來發掘清宮在繪製過程中添加入有關邊疆和戰場本身「想像」。

《平定臺灣得勝圖》製作過程是皇帝下令邊區戰爭的將領僱人繪製稿圖，稿圖送抵京師後再依照既有的規格、技法畫製彩圖，再雕刻銅版，最後印刷。根據現有研究，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彩圖陸續完成時；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要求待臺灣戰圖冊頁畫稿完成後，將原稿取回：「著西洋人賀清泰、潘廷璋照銅板畫法一樣成畫一分」。⁴⁶ 即是，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et, 1735-1813）和「潘廷璋」（即潘廷章，Giuseppe Panzi, 1734-1812）二人的工作正是將彩圖畫成合適製作銅版的底稿。⁴⁷ 此無疑是商議協調並參考底本進行繪製，所見的制式化樣貌。⁴⁸ 最後於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十九日完成所有銅版之製作，前後耗時四年多。⁴⁹ 據此，自福康安進呈稿本後，至少就經歷宮廷畫家繪製彩圖、皇帝瀏覽、西洋畫家製作銅版畫等。因此，以下將把彩圖、銅版畫與《進呈副本》進行比較，藉此清宮重製時在圖上不同階段所呈現的可能觀點和想像。

44 陳韻如，〈畫院運作機制對清代宮廷繪畫的形塑與作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1期（2021.9），頁101-184。

45 陳韻如，〈製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在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故宮學術季刊》，28卷2期（2010冬），頁1-64；陳韻如，〈畫院運作機制對清代宮廷繪畫的形塑與作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1期（2021.9），頁121-127。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51，頁512。

47 賀清泰曾在幾年後見到馬嘎爾尼，並且充當該次的史團翻譯員。參見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秦仲辭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79。

48 陳韻如，〈畫院運作機制對清代宮廷繪畫的形塑與作用〉，《美術史研究集刊》，頁129-137。

49 這一段過程，可參見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25卷2期（2007冬），頁142-152。

負責繪製《平定臺灣得勝圖》的宮廷畫師包括姚文瀚、楊大章、賈全、謝遂、莊豫德、黎明、繆炳泰等。⁵⁰ 早在起稿之初的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七日，宮廷畫家們被要求需會同軍機章京方維甸（1759-1815）和范鰲（生卒年不詳）商議。⁵¹ 且雖然清宮畫師和皇帝均無法親臨臺灣戰場，所能依據的材料繪製除了《進呈副本》與奏摺外，大概僅能仰賴有關邊疆想像、戰場推敲、和繪畫經驗。前述宮廷畫家多有西洋技法繪圖的經驗，即是重要影響因子。⁵² 固然有「西洋徵實」之樣貌，「在熟悉且使用西法的宮廷脈絡中，視覺不僅僅是關乎『看』，而是『視之為學』，視覺成為理解與建構外在世界的重要法門。而這樣法門所建構出來的知識，在宮廷的脈絡中是被視為可以依賴與查考的標準」。⁵³ 不過戰圖畢竟不同於《獸譜》等，既然無法通過親身觀察戰場的狀況，也就僅能仰仗過去經驗建構千里外邊疆戰場場景。

正如皇帝曾指示，地形、地貌等均須符合福康安所述，並用過去《得勝圖》的技法和尺寸繪製，但《進呈副本》到銅版畫仍可見大幅度調整。首先，《進呈副本》中黃龍旗後的福康安是個人功勳的重要象徵，在彩圖和銅版畫中均被人數眾多的騎馬巴圖魯而代，也用許多旗幟出現在同一幅圖中取代唯一龍旗；圖3即是以〈諸羅縣解圍〉做為案例的；另外一個同樣有趣的例子則是彩圖、圖版畫〈斗六門之戰〉中，更是保留了舉旗者，卻將原先在《進呈副本》中緊隨其後的福

50 其中如謝遂、姚文翰、莊豫德等均有西方技法經驗。姚文翰亦有接觸西洋技法的機會，亦有畫製《得勝圖》的經驗，如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與傳教士艾啓蒙（Ignatius Sichelbart, 1708-1780）和奉命照尺寸、章法另行起《平定金川得勝圖》之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總匯》，冊39，頁405-406。莊豫德除了時常被要求畫人物與宗教繪圖亦為一絕，也曾被要求用綢畫西洋人物。《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3，頁615。莊豫德在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莊豫德奉命畫乾隆皇帝臨摹的宋高宗書度人經冊頁；另外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仿畫盧楞伽畫六尊者像冊頁；九月二十二日，莊豫德畫十八羅漢。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七日，莊豫德畫度人經圖24張，發往熱河進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9，頁545、583；冊50，頁195。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艾啓蒙、姚文翰奉命照關樣尺寸章法另行起《平定金川得勝圖》的稿。《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總匯》，冊39，頁405-406。臺灣的彩圖完成後，這幾位畫家隨後亦負責其他的戰圖，例如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平定安南戰圖冊由姚文翰、楊大章、賈全、莊豫德、黎明、伊蘭泰各畫一張。參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1，頁522。

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0，頁659-664。

52 秦曉磊，〈清宮春曉：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故宮學術季刊》，31卷2期（2013冬），頁38。

53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期（2013.6），頁49。

康安刪去、並且增加另外的旗幟於其他軍隊手中。

當福康安抵達臺灣後，映入眼簾的植被與地景想必與過去邊疆經驗相當不同，因而《進呈副本》對於竹林有相當側重。《臺海見聞錄》稱刺竹為臺灣特有種，帶有倒刺，加上數十根生為一叢，其極度密集的程度能抵擋鳥槍和弓箭除是原住民植於屋外防盜，漢人同樣也將之作為防禦工事使用，不僅用在如寺廟等建築物，甚至連府城等初期都是以刺竹修建而成。⁵⁴ 圖 4 以〈諸羅縣解圍〉、〈斗六門克捷〉、〈老衢崎生擒林爽文〉為例，可發現《進呈副本》在諸羅城中的植被中全為竹林，但彩繪本和銅版畫中揉雜了其他樹種，竹林反而成為附屬品。〈斗六門克捷〉一圖有前後兩層城寨，後方城寨有一排竹林向圖右側延伸，展現臺灣地景。不過，彩繪本和銅版畫中均將此抽離。最後，《進呈副本》的〈老衢崎生擒林爽文〉一圖中有一座灰窯，此窯的後方有竹林，但在彩圖和銅版畫上都沒有畫這一竹林。

另一個《進呈副本》和銅版畫間有關地景差異的描繪就是諸羅縣城。⁵⁵ 但《進呈副本》、彩圖與銅版畫版本中，卻呈現截然不同的磚造樣貌？諸羅縣始設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但文武官員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方移至諸羅城辦公，該年用木柵環繞修建四門的城牆，康熙五十六年（1717）因頹傾重修。除以木柵包圍，也圍繞刺竹。⁵⁶ 雍正元年以土城重修，並開挖護城河，雍正十二年（1734）再環植刺竹防衛之。⁵⁷ 康熙年間的諸羅城接近矩形，但在西南處因為埤塘關係，向內收縮，形成類似梯形的形狀；後雍正的土城時期，則將部分原先西北城外區域收入城內，形成類似桃子形狀，因而有桃仔城之名。⁵⁸ 《進呈副本》中的諸羅城幾乎是乾隆十二年（1747）《臺灣府志》的翻版，並繪出刺竹環繞及土城的特色。然

54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卷 2，〈臺竹〉，頁 57；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 2，〈附考〉，頁 61-63；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重修海會寺圖說〉，頁 7-8。

55 《進呈副本》中諸羅縣城乃是根據方志為知識基礎所繪製：參見盧正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107。

56 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 2，〈城池〉，頁 25。

57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卷 2，〈城池〉，頁 58。

58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60 卷 2 期（2009.6），頁 151-180。

而，到了彩繪本和銅版畫中，卻成爲磚造城牆及幾近圓形的建物，並未凸顯出諸羅城獨特蟠桃形狀之特點。諸羅縣變爲磚城當是在林爽文事件結束後、福康安建議下所修；因此，戰事爆發時，諸羅城理當還是一座土牆環繞刺竹的規制。⁵⁹ 顯而易見地，《進呈副本》的在臺施畫者將最重要三特色（蟠桃型、土城、刺竹）繪製出來；然而，對於宮廷畫師來說，諸羅就是一座城池，因而畫出不該出現於此時期的磚牆和形狀，城內的刺竹也被改成其他植物。因而，彩圖和銅版畫中的諸羅城離實際狀況甚遠，而是宮廷畫師以想像取代原有樣貌的展現。諸羅城的案例補充說明了一件重要現象，清宮對於臺灣地景的描繪是在《進呈副本》的基礎下運用想像、經驗替換未曾造訪的臺灣空間特點進行重製。此重製或許呈現了更細緻的筆法，但卻已將原先具有臺灣的痕跡用想像替換掉；相似的狀況，還有〈大武壠之戰〉的城寨等。

運用過往經驗或想像替換和重製，不僅在城堡和地景植被上，同時也在行軍與火炮上。鄭維明曾指出《平定臺灣得勝圖》在描繪戰役主題中，表現了清軍當時的多元裝備和戰術特點，包括冷兵器和火器的交叉使用，鳥槍火炮齊射的場面，登陸戰、山地戰、攻城戰等，呈現清軍戰爭水平。⁶⁰ 不過，很可惜此圖冊所展現的戰爭場面很可能是揉雜過往繪圖經驗的成果。火槍自明代已爲軍隊的標準配備之一，爲了修正裝填時間過長產生的火力空檔，齊射與步兵方陣前進的戰術，例如九進十連環等，都是爲了縮短填裝間隔以期能夠發揮火網的能力。此戰術在林爽文事件時，清軍也發揮的淋漓盡致，例如福康安抵達臺灣前，普吉保等人在抵抗時，就曾以「連環鎗礮打死賊匪」。⁶¹ 在南路與莊大田軍隊交戰的清軍，以滿洲軍隊爲主力，雙方交戰時，奏摺中就言明：「滿漢官軍用連環鎗、子母礮進步施放，約斃賊百餘人，賊各駭奔。……官兵齊用排鎗直壓，賊遂大潰」。⁶² 然而，這些裝備和戰術特點在福康安的《進呈副本》有粗略呈現，尤可發現騎兵在中、熱兵器軍隊在旁、冷兵器步兵環繞外圍的綜合性作戰布置。但在宮廷重繪筆下，除了用極爲整齊地方陣推進強調呈現，另也把戰爭規模擴大；值得注意的是無論

5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52，頁 840-841。

60 鄭維明，〈清《平定臺灣得勝圖》藝術表現特點與歷史背景綜述〉，《文物鑒定與鑒賞》，2019 年 2 期，頁 28-31。

6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1，頁 650。

6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30，479-480。

原圖中的人物是滿洲騎兵、臺灣義民、或是漢人綠營，在銅版畫的這些方陣中均是騎馬並排前進的滿洲騎兵；如此一來就有明顯的重新形塑戰場的痕跡（圖 5）。

以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安得義等西洋畫師所主筆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和《平定金川得勝圖》進行參照。《平定金川得勝圖》多在群山峻嶺之間作戰，因此攀爬、攻打城樓的狀況為主要場景。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中，除格登山斫營、鄂壘扎拉圖之戰等圖外，其餘不少幅圖所描繪的戰場開闊者都有騎兵以方陣前進的場景，此與《平定臺灣得勝圖》的彩圖和銅版畫版本雷同。雖然畫師不同，但是乾隆皇帝要求照用過往《得勝圖》之技法，宮廷畫師將《進呈副本》原來場景進行修改，或是基於過往圖像和技法為參考並添加想像取代的作法。

此外，清軍火炮上也可見從《進呈副本》到彩繪本、銅版畫間的變化。此戰並非以熱兵器對決冷兵器的戰爭，無論是莊大田、林爽文、甚至義民都擁有為數頗多的火器。⁶³ 林爽文包圍諸羅城時，清軍已注意到林軍配備相當數量的鎗礮，尤其極多大砲，雙方曾在一個多月內數次展開激烈炮擊戰。⁶⁴ 清軍也從沿海調派二、三千觔的大砲前往臺灣，並製造砲車以利在臺灣由牛隻運輸。⁶⁵ 透過檔案可發現被記錄在案的火砲共有九節砲、百子礮、子母砲、行營礮、竹營礮、馬蹄礮等六種。⁶⁶ 根據現存的有限資料，雖然不一定精確，但我們至少能知道每一種砲的標準尺寸和用途。九節砲，又稱九節十成砲，多為銅鑄，每一節可拆卸組合，總重

63 林爽文事件結束，乾隆皇帝要求把叛軍所用的竹製盔甲、弓箭等物各挑選一件送往北京。這些武器被收儲在萬壑松風，共計有鐵尖竹弓一張、撒袋連箭一副、半截刀一把、槌刀一把、鈎連刀一把、牛角叉一支、三尖叉一支、竹篙矛一支、竹篙鎗一支、鳥鎗一桿、炮一尊、皮藤牌一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20，頁 46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0，頁 552。

6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3，頁 679-685。

6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16，頁 300。此早在朱一貴事件爆發時，清軍將領林亮（1664-1727）就已經發明新式砲車搭載子母砲用以適應臺灣獨特地形。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 4，〈覆將弁矜功缺望書〉，頁 49。

66 清軍曾從叛軍手中奪獲九節礮、行營礮、子母礮、馬蹄礮、鹿鎗、竹營礮等火器；清軍也有行營砲、子母礮、百子礮、鳥鎗等物。戰爭結束後，福康安從叛軍和義民處總共收繳大、小砲位共 462 門、鳥鎗 864 桿；此外清軍官員自行鑄造 685 門。例如，徐夢麟在戰爭期間，曾自行收買民間農具、廢鐵，鑄成九節礮 240 位，稱為：「到處用以轟擊，甚為得力」。戰爭結束後還有 223 門堪用，因此收繳庫房。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35，頁 558-562；卷 17，頁 309-314；卷 15，頁 275；卷 23，頁 379-380；卷 46，頁 741；卷 65，頁 1035-1037。

約 790 到 798 觔左右，長約 5 尺 1 寸到 6 尺 9 寸之間，配以特殊設計過的四輪砲車。⁶⁷ 子母砲僅重 95 或 85 觔，長僅 5 尺 3 寸或 5 尺 8 寸，多以鐵鑄造；⁶⁸ 百子砲與九節砲和子母砲相當類似，一般鐵鑄，並有五道鐵箍，然而裝填不便，且威力與大型鳥槍相去無幾；且百子砲並無砲車，而是採用腳架。⁶⁹ 同樣沒有砲車、攜帶方便的火器還有行營砲和馬蹄砲；前者同樣鐵鑄，長僅 1 尺 6 寸到 1 尺 8 寸之間，重量也僅 80 觔，置地可擊。⁷⁰ 馬蹄砲同樣威力不大，在軍營中常用作行軍號令之用。⁷¹ 根據這些描述，可知道無論是清軍或是叛軍大多使用輕型、攜帶方便或有特殊砲車的火器。

圖 6 揭示〈攻克大里杙〉和〈集集埔克捷〉二場繪有火炮的戰役，除了火炮數量不同外，《進呈副本》對於樣式繪製最為粗略、彩圖次之，而銅版畫則是增加不少細節。以攻克大里杙為例，《進呈副本》中僅有 6 門火炮，但彩繪本和銅版畫卻有 9 門；《進呈副本》在集集埔戰役中描繪出兩門四輪砲車搭載的火炮與 2 門以腳架使用的火炮，彩圖版本和銅版畫均僅有 1 門四輪砲車的火炮與 2 門用腳架使用的火炮。彩圖和銅版畫的砲身均繪有鐵箍，考量到曾閱覽過奏摺的宮廷畫家和西洋畫家中，如賈全就曾參與乾隆皇帝重訂並標準化禮器《皇朝禮器圖式》的繪製。⁷² 因此當在《進呈副本》中看不出各門砲形制時，《皇朝禮器圖式》或就可權充參考，當中又可能會以奏摺中常出現的九節砲、百子砲等作為主要標的。〈攻克大里杙〉砲車型制則未有尾部的橫軸，加上其砲身鐵箍甚多，與九節十成砲車類似。〈集集埔克捷〉的銅版畫版本又較彩繪本詳細，可見砲車有往後延伸的彎曲支撐設計。依照《皇朝禮器圖式》（圖 7），可知砲車有下列幾種型制，包括有

67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卷 16，〈武備四〉，頁 17-18。

68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武備四〉，頁 21-23。

69 (清) 韓世琦，《撫吳疏草》，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26，〈報銃砲工料價值疏〉，頁 27；李紱，《穆堂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39 上，〈請造廣東五子礮位疏〉，頁 1。與子母砲相似之處在於此種火炮「百子礮，每大礮一中藏小礮百，每一礮鳴，旋貯一礮之藥與鉛，連絡而開，一礮可以當百次」。參見薛熙，《練閱火器陣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 1，頁 3-4。

70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武備四〉，頁 28。

71 (清) 清世宗敕編，《硃批諭旨》，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卷 166，頁 56。

72 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2 期（2020 冬），頁 1-56。

雙輪的金龍砲車（神威將軍砲車、渾銅砲）、雙輪的致勝將軍砲車（嚴威砲）、四輪的神威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砲、鐵心銅砲）、四輪的威遠將軍砲車（衝天砲）、前雙輪後單輪的神威無敵大將軍砲車（神功將軍砲、紅衣砲）、雙輪的得勝砲車、四輪子母砲車（龍砲）、臺灣砲，此外還有奇砲、行營砲等無砲車者。⁷³集集埔之戰中有一門四輪砲車的尾部清楚的二軸，其型制並非四輪的神威大將軍、威遠將軍、子母砲、九節十成之砲車等；不過卻與臺灣砲車式相似，不似神威大將軍砲車式後方還拖曳著一橫桿。若然如此，臺灣砲理論上並未在林爽文之戰中被利用，但卻曾是清廷火力最強大的武器之一，因此有宮廷畫師的天外之筆。⁷⁴亦即，福康安在《進呈副本》中凸顯的是使用大砲進行攻擊，在細節上並不被重視；相反地，對於宮廷與西洋畫家來說，福康安在臺灣主要使用有鐵箍的小型火砲，因此將這種無砲車的火砲展示；然而，對於有砲車的火砲卻不是畫成九節砲的樣式，反而參考臺灣砲的模樣，因而相較於稿本更加精緻——只是大概僅是他們的經驗和想像。

福康安在奏摺中屢屢強調林爽文部眾擁有為數頗多的馬匹，是他強調自身軍功時不可或缺的一環，進而彰顯於《進呈副本》中。過往學者通過多語文材料馬匹在滿洲文化中具有獨特的地位。⁷⁵《進呈副本》無論是敵或我方之馬匹並沒有明顯差異，馬匹間僅有顏色與花紋上的不同，但敵我相似。

把焦點移往宮廷畫家和西洋畫師重繪的圖冊和銅版畫，圖9展示彩繪本中出現的馬匹在花紋上可以看到與清代諸多駿馬圖繪相似；且因為負責彩圖的宮廷畫師有不少具有繪製馬圖的經驗，⁷⁶或許體現在彩繪本中馬匹花色多樣，除了出現最

73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16，〈武備四〉，頁5-30。

74 有關臺灣砲，可參見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本4分（2010.12），頁804-808。

75 駱愛麗，〈〈愛烏罕四駿圖〉回文題記釋義初探〉，《故宮學術季刊》，30卷4期（2013夏），頁207-243；林世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2期（2006冬），頁51-108。

76 若思考畫家之一的賈全同樣侍奉於宮廷，除了繪製地宮圖等，最知名作品則是畫製與動物相關的圖繪，包括《八駿圖》。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月，賈全奉命描地宮圖；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奉命仿嚴宏滋中元地宮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賈全開始奉命畫《八駿圖》，同月也奉命畫釋迦摩尼佛衣服；乾隆四十九年十月，賈全與楊大章一同負責幾處匣蓋的繪製，賈全負責其中的三星圖鑲嵌樣四週圍，同月賈全的《八駿圖》也被提到；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賈全負責畫射虎射鹿紙樣，仿照各畫一張；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賈全再次奉命繪製三星圖；乾隆五十年九月，賈全奉命畫一幅人物圖；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總匯》，冊39，頁497、529-534；冊47，頁634-636、650；

頻繁的白色馬匹外，另外還有許多不同顏色、花紋。⁷⁷ 雖然不知道這樣的繪製是否源於畫家們曾有繪製駿圖的經驗，但至少可因此知曉他們利用已知的「馬」來取代毫無區別的《進呈副本》之馬匹。

此外，並非在清宮重製的內容就屬於鐵板一塊，以圖 10 為例似可說明宮廷畫家和西洋畫家對於戰鬥畫面的想像差異。以〈生擒莊大田〉之圖說為第一個例子，海面上船隻繪製有所差異。一艘小船尾端有一位看似指揮的將領在彩圖中舉手投足，在其後還有二位手持鳥槍的士兵；這些狀況在銅版畫中並未被呈現。人群的增減也多有跡可循，例如〈進攻斗六門〉中也有原先在彩圖中二名身著八旗鎧甲的騎兵卻並未被畫在銅版畫中。⁷⁸

《進呈副本》中，每幅均有叛軍逃離戰場的畫面，因此圖與圖之間好似在訴說戰事尚未完結的連續性。然而，銅版畫將這些逃離戰場抽離，即是中斷脈絡性質。又例如有關臺灣義民的服飾，在《進呈副本》與銅版畫之間相差甚大，《進呈副本》中的義民頭上類似將髮辮盤在頭頂，但銅版畫中義民則是戴著頭飾小帽。由於福康安與施畫者均有機會親自觀察臺灣本地的義民，但是宮廷畫師並沒有機會觀察到他們的服裝衣物；不過相反地，因為當時清宮已見過來京原住民，反而可以畫出更精確的鹿皮衣著。⁷⁹ 至於為何清宮要針對這些進行修正，而不延續《進呈副本》提供的資訊繪製，則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和證據之出現。

綜言之，彩繪本或銅版畫中有關竹林、城池、行軍、火炮等都並非真實在臺灣戰場中的樣貌，而是來自清宮對「邊疆戰爭」的設想。現有材料難以知曉彩圖的宮廷畫家和銅版畫的西洋畫師對於圖畫繪製的差異是否來自不同的認知，不過根據目前分析，至少可清楚地發現清宮內包括畫家、皇帝在彩圖、銅版畫版本整體上改編自《進呈副本》，利用西洋筆法增添新的內容並將既有福康安功績的部

冊 48，頁 293-295。

77 從外觀而言頗類似如紅紋白底的赤花鷹、全身褐色的大宛驕、黑毛褐底的自在驕、白底褐紋的爾雲駛等。相較而言，銅版畫或許因為技術和印製關係，馬匹無法辨認顏色，但卻可發現花紋上發現與彩繪本有不同之處。

78 實際上，差異不僅在戰爭場景中，在〈生擒莊大田〉和〈渡海凱旋〉二幅圖中，彩繪本上畫有船隻相當重要的船頭眼；然而，在銅版畫中就沒有這一展現，不過卻在花紋上有較細緻的描寫。這樣的花紋細緻也可以見到在〈清音閣凱宴〉中的清音閣上，彩圖並未針對閣樓的裝設有描寫，但是銅版畫卻在屋簷上畫著「卍」字裝飾（可參見圖 10）。

79 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頁 112。

分抽離，以過去擁有的圖畫畫製經驗取而代之、去脈絡化，展現一幅畫作的全新樣貌。

四、乾隆皇帝理想下的帝國宣揚與滿洲族群政治

雖然清宮畫家們如前所述擁有一定程度自主性，但仍受到皇帝監督與制衡，尤其畫稿均經由皇帝御覽得到指點和批准方能作畫。⁸⁰ 將畫作視為歷史情境投射或分析皇帝文化態度是曾是清畫研究主流。⁸¹ 《平定臺灣得勝圖》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乾隆皇帝和帝國所需，因此不意外地會受到皇帝意志之影響。⁸² 因此，乾隆皇帝想要通過這幅圖呈現甚麼樣達成何種理想？又這樣理想是如何被實踐？本節嘗試闡述乾隆皇帝對於此圖冊運用上的期待，包含三個面向：海疆勝利、宣揚國威、滿洲族群政治。

對乾隆皇帝而言，此戰特殊性何在？據〈御製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稱：「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崇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慙，弗薈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⁸³ 值得逐一釐清蘊含在內的比較概念；乾隆皇帝拿來比較的是帝國空間拓展的三件「大政」，而林爽文事件在偉業中似乎是位處「內地」叛亂和帝國擴展之間。若以此位處「內地」和擴張之間的角度來觀察林爽文事件為基點，可發現從《進呈副本》到《得勝圖》，除前述宮廷畫家既有技法差異、想像取代印象等特質外，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船隻、海洋之強調。〈枋寮之戰〉將原先《進呈副本》中以陸路為主戰場的樣貌，轉換成以海洋波濤為核心，船隻也放大數倍、重視海上的功績；類似的還有〈生擒莊大

80 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4期，頁3-21；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乾隆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9），頁225-269、346。

81 陳韻如，〈時間的形狀——〈清院畫十二月令圖〉〉，《故宮學術季刊》，22卷4期（2005夏），頁105。

82 如秦曉磊對於仿古畫重新詮釋更動的討論，畫風、增補、清代狀況的穿插，利用西洋技法重新構圖等，以及最後乾隆皇帝作為「贊助者」讓圖像畫題改變都源於皇帝意志，這些變革不僅在仿古畫作上可見，甚至可以視為一種模式；不過正如作者所說，畫者對於皇帝干預的態度已經無從得知。秦曉磊，〈清宮春曉：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頁37-100。

83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00，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癸酉，頁484b。

田〉一圖，同樣在船隻和海洋上《得勝圖》；另外，皇帝要求繪製〈渡海凱旋〉以及在熱河凱旋會上，二艘船隻被畫出。

實際上，馬嘎爾尼使團在熱河期間，曾使團接受招待觀賞演戲時，最後一齣戲讓使團印象深刻，展現了大地和海洋結婚的故事。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則等英國人均認為，這是一樁「來表達世界概略」的戲碼。⁸⁴ 葉曉青指出此是爲了該朝貢所編的劇碼，同時展現皇帝的個人意志，名爲《四海昇平》的樣式戲，並且分持雲使分福祿壽三層舞臺進行表演。此戲曲最獨特的地方在於真實和虛構同存，對白中就提到啖咭利之名。⁸⁵ 此劇的重頭戲在於文昌帝君路過海濱時，招來四海龍王詢問何人阻擾，四海龍王回覆：「海宇承平，年來久已。此乃一頑蠢巨龜，吞吐風濤，因此把雲頭阻住」。文昌帝君因而回覆稱：「啖咭利國貢使等，進表賜宴畢，部日賞賚遣還，海道亦當肅清，爾諸神亦當保護，使他們穩渡海洋，平安回國，方爲仰體聖主仁德之心也。豈可容此輩魚蟲，興風作浪？」⁸⁶ 葉曉青認爲乾隆皇帝的虛榮心讓他將「文德征服力」——相對於平定西域後《八佾舞虞庭》中的武功征服力——展現其中。⁸⁷ 配合彩繪本和銅版畫，其中有持雲使、四海龍王等，或許這次清音閣上所展演的劇碼即是另一改編版本。由此，大概更可以理解皇帝期許的「四海昇平」之意象。

又，〈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中，多次強調剿滅莊大田時清軍水師的封鎖海岸、合兵圍剿的功勞。⁸⁸ 〈御製平定臺灣功臣像贊序〉中，「福康安、海蘭察等渡海搜山，竟成偉勳靖海疆」，也提到「誠以海疆民命，不得不發師安靖」。⁸⁹ 這些《得勝圖》和《進呈副本》之間的差異在在強調此戰對於皇帝而言，關鍵或許出在「海疆」。正如〈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熟河文廟碑文〉所述的，這場戰役的結

84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194、200。

85 葉曉青，《〈四海昇平〉——乾隆爲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二十一世紀》，105 期（2008.2），頁 99-100。不過陳韻沅提醒我們這些劇本很可能是同名異本；參見陳韻沅，〈明清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政大中文學報》，37 期（2022.6），頁 20。

86 葉曉青，《〈四海昇平〉——乾隆爲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頁 99。

87 《四海昇平》這齣劇在嘉慶朝蔡牽被平定後，龍王的回答則有所修改，並且提到了剿滅蔡牽的故事。葉曉青，《〈四海昇平〉——乾隆爲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頁 102。

88（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0，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癸酉，頁 486b-488a。

89（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00，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癸酉，頁 488a-488b。

果是：「永奠海疆，光我王度。」⁹⁰ 也在〈御製四知書屋記〉中，稱：「茲幸賴天祐，彰國威、定海滙。」⁹¹

原置於臺灣府城的九通碑刻，若攬取其中文字進行比較，可發現皇帝希冀強調這場海疆戰爭的獨特之處。在〈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中，稱：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專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慚弗薈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⁹²

九通碑刻除了被放置在府城外，其中某幾通碑亦同時被製作放在他處，〈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則被放在熱河文廟大成門外：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既舉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為三大事，嵩文勒太學；其次三為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薈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⁹³

而〈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則除了勒石為碑外，也被放在北京紫光閣中：

近著勦滅臺灣賊匪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以為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嵩文；王倫、蘇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薈其功。若茲林爽文之勦滅，介於六者間，雖弗稱大事，而亦不為小矣。故其次三，訖未紀勳圖像；而茲福康安、海蘭察等渡海搜山，竟成偉勳，靖海疆，吁！亦勞矣，不可湮其功而弗識。故於紫光閣紀勳圖像，一如向三事之為。然究以一區海濱，數月底績，故減其百者為五十。而朕親製贊，五十者為二十；餘命文臣擬撰，一如上次之式。⁹⁴

三者共同內容不脫闡述林爽文戰事的平定對皇帝而言，屬於伊犁等大事和內地叛

9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製文，頁 85。

9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製文，頁 81。

9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製文，頁 75。

9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製文，頁 81。

9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御製贊，頁 86。

亂間某個模糊空間，在同樣放於熱河、北京處的碑刻上之展示文句中，則強調此戰屬於「介其間」、「介於六者間」；熱河碑文上提到「孤懸海外」這一特點，在像贊上也提及「靖海疆」。因此，臺灣府城空間上，所有人均可以見到九通滿漢碑刻的內容，但在熱河和北京二處「帝都」，所能見到的則是強調臺灣之戰介於內地和大事的特點以及位於海疆的特殊之處。

現存滿文碑刻因為年久風化判讀難度較高，不過根據拓本還是能夠稍稍判別其中的文字。其中，〈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提到「然究以一區海濱」，查閱滿文版本會理解「海濱」一詞在滿文寫作 *mederi jakarame*；根據乾隆三十六年完成的《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稱此為漢文的「沿海」，定義為「海濱一帶所有地點稱為沿海（*mederi dalin i šurdeme bisire ba be mederi jakarame sembi*）」，而《清文彙書》則定義為「海岸周圍」。⁹⁵ 同一份材料提到「靖海疆」寫作 *mederi jacen be toktobuhengge*（安定海疆）。⁹⁶ 根據道光年間的滿漢《六部成語》，「海疆（*mederi jecen*）」意味著「近海的邊界」。⁹⁷ 因此，通過〈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的滿文書寫，大概可理解皇帝認為這是一場發生於「近海的邊界」的戰役，並且在福康安等將領的努力下 *toktobuhengge*（安定）了該處。

既然知曉林爽文之戰對於皇帝的重要性在於「海疆」，那究竟什麼是海疆？在清代，「海疆」一詞除了稱呼沿海空間外亦是行政體系分類的一環。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太和殿的殿試中略見皇帝對於帝國空間的理解：「幅員所暨，漸被無垠，若海疆、若朔漠、若蠻陬絕徼，曷嘗不列斥堠、置戍守」。⁹⁸ 此外在許多例子

95 (清) 傅恒，《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51；李延基，《清文彙書》（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京都英華堂藏版），卷8，頁11，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檢索時間：2023年7月2日）

96 此拓碑曾刊於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上冊，頁105；不過該影印版無法辨識，由於該拓本現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並且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於「典藏臺灣」網站中公開全文影像，並標示檔案號為 RT00042_6，參見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2/6d/87.html>（檢索日期：2023年8月15日）。然而此檔案號被標示為「御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滿文）」，實際上是錯誤的，其內容該是「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滿文）」，特此說明。

97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明清檔案百科《六部成語》」<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phrase>（檢索日期：2023年8月15日）

98 值得一提的是，此為給予未來即將充當朝廷棟樑的考試，因此更有其重要性；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88，乾隆十六年五月十日丙午，頁91a-97b。

上，均可發現「海疆」是類似於「苗疆」、「煙瘴」、「佐雜」的行政分類，需熟悉風土者才能前往補缺。⁹⁹ 不過，是否被定義為海疆並非固定，例如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朝廷決議將原屬於「海疆」的瑞安縣改為「衝繁中缺」，並將其上的「海疆」二字刪除，因「查所轄並非外洋」。¹⁰⁰ 據此，可以推敲海疆所轄需與外洋攸關；既攸關外洋，那就與其相對地內地有所差異，例如乾隆二年（1737）十月，巡視臺灣御史白起圖在檢視完臺灣的營伍情形後回報狀況，乾隆皇帝表示：「海疆武備尤與內地不同」。¹⁰¹ 巡視臺灣御史亦有相同看法，如熊學鵬曾稱：「臺郡孤懸海外，情形與內地不同」。¹⁰² 更重要的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稱「臺灣孤懸海外，尤非內地濱海要區可比」。¹⁰³ 如此一來，「孤懸海外」當是臺灣作為海疆一部分和內地差異的特質。¹⁰⁴

99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91，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二十九日甲申，頁 754a。(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27，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庚申，頁 772a-772b。甚至「海疆」之缺，照規定甚至不准以試用知州擔任。(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05，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癸酉，頁 791b-792a。又，例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廣東巡撫蘇昌在揀選肇慶府陽江縣知縣時，稱「籲請調補海疆縣令」。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輯 1，頁 471。

100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18，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癸丑，頁 665b；並非所有臨海區域均屬於「海疆」，例如浙江提督陳倫炯在闡述玉環軍事時，就提到了海疆並不同於外洋；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39，乾隆十年四月二十九日辛未，頁 85b。類似的狀況還有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將寧波府象山縣改「寧波府屬象山縣，刪去海疆字，為專難簡缺」。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95，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己亥，頁 686a-686b。

101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5，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癸丑，頁 915b。

102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98，乾隆八年八月初八日戊午，頁 548a；甚至連巡察御史的設立都與海洋有關，「向因臺灣為海外要區，設立巡察御史，原以表正風俗稽查彈壓，除別弊端」。參見(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86，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三日癸巳，頁 726a。

103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69，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壬戌，頁 683b-684a。

104 乾隆 13 年獲悉巡視臺灣御史伊靈阿和白瀛所報，當時皇帝的回覆即稱：「臺灣不比內地，更宜加之意也」。(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25，乾隆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辛巳，頁 378b；乾隆十五年九月，喀爾吉善同樣論述：「查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72，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二日辛亥，頁 1112b；十八年五月，皇帝亦稱：「臺灣遠在海中……與內地迥不相同」。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輯 5，頁 440；乾隆皇帝這樣的概念在二十七年六月再次重申，指出：「臺灣一鎮孤懸海外，更與內地不同」。(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十日辛丑，頁 431b-432a；乾隆三十三年 10 月，相關論述也未改變：「況臺灣遠隔重洋，更非內地可比」。(清)慶桂、董誥等奉敕

莫非僅因是一座島嶼，就和內地不同嗎？那如海南島、玉環等島嶼，又該如何被看待？跟其他「孤懸海島」島嶼相比，臺灣的特點在於和異國一樣均是「遠隔重洋」。¹⁰⁵ 正如乾隆二十三年九月閩浙總督楊應琚在一次攸關軍事論述中，做了清晰的比較，臺灣「遠隔重洋」，而如定海則是「孤懸海中」。¹⁰⁶ 將「海疆」、「重洋」的空間特性觀念放在《得勝圖》的脈絡上，將有助理解戰圖繪製空間和戰役並非隨意選擇，而需要符合帝國宣揚。乾隆皇帝針對《金川戰圖》最初稿本的要求即是對山川險惡之地和官兵出力攻克地點為核心。¹⁰⁷ 這樣的揀選標準同樣出現在《平定臺灣得勝圖》中，例如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時，皇帝就要求「即日擒獲莊大田，其南路險要地方，亦照此辦理」。¹⁰⁸ 換言之，若臺灣與內地有行政、實質上差異，而臺灣又做為「海疆」一部分，在空間上的「重洋」特性與異國更為接近。再根據戰圖一向的繪製標準，林爽文之戰之所以與其他內地叛亂有所差異，並受到皇帝重視，更可能是因此此戰是發生於跨海「遠洋」在「海疆」上的戰爭；更重要的是，在此戰中是由他深感驕傲的滿洲將士——不僅是他深信有意培養的福康安——所締造勝果。

如前所述，福康安在《進呈副本》中嘗試揭露自身戰功，乾隆皇帝也對他所期待。不過，實際上在戰爭發生的十年前，他似乎並不符合皇帝滿意定義下的「滿洲」。¹⁰⁹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十九日，福康安一份奏摺中，提到人參之

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20，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七日辛酉，頁 1130b-1131a；乾隆四十六年九、十、十一月，皇帝同樣再次重申「諸羅係隸臺灣，海疆要地」以及「諸羅、鳳山俱隸臺灣，遠隔洋面尤非內地可比」、「遠隔重洋，非內地可比」。(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41，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戊午，頁 279b-280a；卷 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四日癸未，頁 307a；卷 1144，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頁 340b-341a。

105 考察《清實錄》從雍正朝到嘉慶朝共計 73 筆描述「遠隔重洋」的描述中，除了描寫蘇祿、暹羅、呂宋、緬甸、英咭喇、安南等地外，其餘均在談論「臺灣」共計 57 處。

106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70，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壬辰，頁 232b-233a。

107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84，乾隆四十年六月初五日辛巳，頁 134b；卷 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癸未，頁 473b；卷 1006，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丙午，頁 505a-505b。

108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99，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壬子，頁 462a。

109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所闡述的「滿洲之道 (Manchu way)」：雍正時期已致力建立滿洲族群 (ethnicity) 認同來扭轉愈來愈嚴重的漢化現象，繼之乾隆朝針對八旗進行制度改革，不僅維繫了該制度的存續，也確保在十八世紀晚期被滿洲族群認同之建構，形塑出新的「滿洲之道」，強調滿洲習俗的重視和實踐，包括弓術、騎術、滿文能力與簡樸，其中滿文尤為重要，

事，乾隆皇帝就批評：「福康安之清語音何如此欠缺？人參只有生熟兩種，何以有活參？」¹¹⁰ 是否符合滿洲或是否需要動用滿洲軍隊，隨著戰爭的推進一直是皇帝關心的核心課題。

實則，考量到清宮基於《進呈副本》重製為彩圖、銅版畫過程中，將眾多滿洲軍士畫入，可發現乾隆皇帝想在圖中展現的不會是「一位滿洲將領」的功勳，而是所有滿洲兵士的努力。林爽文事件爆發之初，乾隆皇帝指出林爽文等：「臺灣地方肆虐之匪，為烏合之賊，一經剿辦，即可全行殲滅」，認為毋須調動廣州、杭州等地滿洲兵丁。¹¹¹ 不過，七月初六日就意識到錯誤，下令江寧將軍永慶率領杭州滿洲兵丁前往臺灣，並叮囑「永慶系承蒙朕恩任將軍之人，且為滿洲，抵達臺灣後，剿辦之時，務必率兵奮勉效力，斷不可玷污滿洲名譽」。¹¹² 此段文字中強調「且為滿洲」和「滿洲名譽」的重要性。七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在給常青和他於該年年底評價為「不中用之物」的恒瑞之上諭中，¹¹³ 指責地稱為何從臺灣遞來的奏摺都沒有提到滿洲兵丁衝鋒的狀況，認為常青等人「未令滿洲兵丁衝鋒在先」，並引用康熙時期進兵西藏之先例：當時有官員建言不得派遣滿洲兵丁進去「險惡之地」，導致滿洲兵丁畏避而遭綠營兵丁鄙視。乾隆皇帝憤怒地指出若有官員再有此建議定當場正法。乾隆皇帝強調滿洲奴才世代受國家恩典，需衝鋒在前，在臺灣也需如此，不能讓綠營和義民在前，被人恥笑，當勇往直前做為表率，強調抵臺的滿兵參戰狀況需如實稟報。¹¹⁴ 隨後於七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要求準備前北京的廣州將軍存泰停止行程，待副都統博清額率領滿洲兵丁在臺灣戰爭勝利後再一併赴京。¹¹⁵ 該年八月十二日，乾隆皇帝停止福康安調派四川番兵，其理由除因距離遙遠外，更因臺灣已有「上百名巴圖魯侍衛、章京」領兵，且有眾多的滿

成為隸屬八旗者的標準符碼。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9, 13, 34, 275-299, 306, 343-344.

1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釋編》，冊 13，頁 583-584。

1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釋編》，冊 19，頁 565。

1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釋編》，冊 19，頁 606。

113 關於稱恒瑞為「不中用之物」的奏摺來自該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硃批。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輯 66，頁 429。

1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釋編》，冊 19，頁 609-610。

1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釋編》，冊 19，頁 611。

洲兵和數萬綠營；暗示他信任滿洲軍隊的勇武能力。¹¹⁶ 因此，當福康安派赴臺灣時，這場戰爭在皇帝心中已不僅僅是場地方叛亂，而涉及滿洲勇武文化和族群性的複雜期待。正因如此，可以發現《進呈副本》中許多原是綠營或是義民在彩繪本和銅版畫中被滿洲軍隊所取代，彩圖、銅版畫則將福康安所強調的個人功勳拿掉，用滿洲巴圖魯的英勇取代之。

雖然圖像上看來似乎滿洲軍隊縱橫戰場，但其實從戰爭尾聲和結束後的隻字片語，可見皇帝期待並未真的被實踐。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滿洲侍衛、巴圖魯等因「不慣乘舟」患病，乾隆皇帝令：「福康安、海蘭察等，遠涉重洋，備嘗辛苦；而普爾普、舒亮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生長北方，未歷風濤之險，今因乘舟不慣，偶有患病，覽奏甚為軫念！」¹¹⁷ 該年十二月十六日，皇帝根據福康安奏摺指責柴大紀與蔡攀龍時，強調綠營不可缺，但「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務在在需人任使，遇有軍務，勢不能祇仗滿洲官兵」。¹¹⁸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皇帝對於恒瑞的批評中，提到：「朕因念恆瑞年輕無識，且係宗室，姑援議親之條，不即置以重典，僅令回京候旨，已屬格外施恩。乃福康安節次奏到之摺，曲為庇護，將恆瑞聯寫銜名，又屢於摺內聲敘恆瑞帶兵打仗。試思伊為滿洲大臣，眾皆打仗；伊不打仗，逃往何處乎？」¹¹⁹ 戰爭結束後，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乾隆皇帝要求福州將軍魁麟督促訓練滿洲兵丁，因為這次在臺灣，福州滿兵「抵達臺灣以來，不過逐隊行走，毫無奮勉，殊屬可恥」，乾隆皇帝也同時把福州兵丁將官無法流暢地使用清語與這件事情一併談論，認為福州滿兵缺乏訓練，暗示他們未達「滿洲之道」的標準。¹²⁰ 即是，對於乾隆皇帝而言，這場在遠洋之處的戰爭從原先內地叛亂無需滿兵，變成一次位於遠隔海洋的險惡之地，並且希望參加軍隊可符合他所定義的滿洲之道。

既然符合了滿洲之道，又繪製了圖像來凸顯，那又該如何宣揚？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八日總管內務府大臣舒文將四十三年粵海關送來的印圖紙 2,480 張，其

1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釋編》，冊 20，頁 409。

1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4，頁 699-700。

11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48，頁 768。

11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51，頁 817-818。

1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20，頁 493-494。魁麟隨後於 7 月初 4 日改名魁倫；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21，頁 434-435。

中海水潮濕霉爛的 1,730 張交給太監鄂魯里轉交予杭州織造基厚「照依圖張尺寸進數另行抄做作」送往北京壓印臺灣圖，不足者用白露紙壓印，第一次預計複印 200 份。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十九日，臺灣戰圖 200 份和其他戰圖陳設清單送交瀏覽，並根據往例，其中 120 份裱冊頁配合木匣，其餘 80 份裡面的 15 份交啓祥宮裱做分賞阿哥們與軍機大臣，剩下的 65 份則交給軍機處擬賞。¹²¹ 此後同月二十七日第一批完成的裝裱 52 冊，在十二月初二日由當時擔任駐藏辦事大臣、工部尚書的和琳查收了第一批戰圖：「賞黑龍江將軍衙門臺灣戰圖一卷、盛京將軍衙門臺灣戰圖一卷、吉林將軍衙門臺灣戰圖一卷、伊犁將軍衙門臺灣戰圖一卷、烏里雅蘇臺將軍衙門臺灣戰圖一卷、烏魯木齊督統衙門臺灣戰圖一卷」。¹²² 換句話說，除宮廷內阿哥和軍機大臣外，位於內亞邊疆的封疆大吏均是首批獲得賞賜者。¹²³ 首批贈送予內亞地區可以清楚地發現對於乾隆皇帝而言，修改過後版本中強調滿洲勝利是需要立即在內亞進行宣傳。

「海疆」的勝果除了首先在內亞區域被宣揚，當然也是賜予各地督撫官員，亦贈予來朝外國之禮物。贈送外國多是事先備妥，例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要求造辦處回報回部、金川、水法等圖印製和庫存狀況，造辦處管理事務大臣伊齡阿回報回部圖曾印 237 份、金川圖印 210 份、水法圖印 200 份，都已陳設或賞用並無庫存。皇帝因此要求各印 10 份，並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七日完成，

121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皇帝已下旨將銅版圖紙交給造辦處收儲準備「印圖用」。五十五年正月初七日，凱旋渡海圖的銅版完成；五十五年五月初六日攻克斗六門、攻克大武壠銅版完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0，頁 100。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造辦處圖房印好首批 52 冊交給啓祥宮裱裝。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銅版 12 塊印 200 份，使用了 2,400 張紙，這些銅版使用了紅銅 457 斤 2 兩 2 錢，每一塊花費銀 188 兩 6 錢 8 分 5 厘，總共花費銀 2,264 兩 2 錢 2 分，壓印了 3,792 張，僅有 2,400 張可用，還有廢紙 1,392 張。這些紙當中用了杭州織造抄做圖紙 2,330 張，尺寸是長 1 丈 2 尺，寬 5 尺 4 寸，白露紙 243 張，印圖工料則是 591 兩 5 錢 5 分 2 厘。清圖 12 張，花費銀 438 兩 6 錢，因此這一次的印製總共花費 3,294 兩 3 錢 7 分 2 厘。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六日，懋勤殿交上臺灣圖 6 份、金川圖 3 份、水法圖 3 份給如意館裱框鑲邊。若跟過往圖冊進行比較，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調查中，平定西域戰圖共印 247 份，實用 109 份、陳設 138 份；金川圖印 220 份，陳設 138 份、實用 82 份；臺灣圖印了 200 份，陳設 119 份、實用 81 份；安南戰圖預計印 200 份；廓爾喀戰圖則正在繪製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0，頁 659-664；冊 53，頁 237、622。

1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3，頁 183。

123 即使並未在朝中服務，但是受到皇帝重視者也可能獲得戰圖賞賜，例如漳州人蔡新就獲得臺灣圖冊一分。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3，頁 635。

準備用來賞賜給即將來京的朝鮮、暹羅、琉球、安南等國各一份，其他交給懋勤殿收藏。¹²⁴ 也就是說當時加緊印製、前一年就開始準備的戰圖，是一種提早備妥計畫中的禮品。

然而，若如此高度政治宣傳成份的物品成爲臨時起意、計畫之外的贈禮，似乎更具意義，這樣的例子就可以在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之事上發現。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1793年九月十四日），乾隆皇帝於熱河接見英國馬嘎爾尼使團，同日即令自遙亭行宮圖匣裡，取伊犁回部圖一分和臺灣圖一分賞給「啖咭利國」，並由如意館裱框，並同時要求另外補二幅圖冊回行宮擺設。¹²⁵ 由此可知，皇帝是當下就急於進行裱框備禮。隔日，英國使團一行在和坤、福長安、福康安、松筠等陪同下參訪萬樹園並上岸參觀宮殿，在此見到了懸掛著乾隆皇帝的「功業圖」。¹²⁶ 由於在〈賞啖咭利國王物件〉是早由軍機處擬定乾隆皇帝批准，但其中包畫絹 20 張外，並無「戰圖」。¹²⁷ 但隨後在九月二十日，使團收到了一批額外新贈給英國國王禮物，其中包括了「圖畫」；雖然馬嘎爾尼並未明言這些圖畫的內容，但考量到接見的同時在密雲的行宮取圖的時間差，額外獲贈該是臺灣圖和伊犁回部圖。¹²⁸

爲何皇帝要特別從行宮中抽取並贈送這兩冊戰圖——尤其尚有金川、安南等圖可贈？¹²⁹ 乾隆皇帝對於這場戰役和戰圖繪製的政治目的是一場在海疆由滿洲將士締造的勝果，海疆、遠洋等元素均爲重中之重，而正如乾隆五十四年一月，福康安接任兩廣總督負責安南戰爭時，「前年臺灣賊匪滋事，本部堂奉命渡海勦捕，立將賊首賊目全數生擒，剋期蕙事。爾等僻處海隅，於本部堂出師金川等處或未聞知，至臺灣與安南海道可通」。¹³⁰ 該年三月，也稱：「前年林爽文等以臺灣地隔重洋，聚眾滋事，本部堂復帶兵渡海勦捕。旬月之間立將林爽文等生擒解京，盡

1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1，頁 330。

1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3，頁 762。實際上，馬嘎爾尼使團在密雲就曾居於該行宮，並且在此接受一場宴會，參見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112。

126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165。

127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161-162。

128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206。

129 甚至在提及西藏問題時，根據馬嘎爾尼的調查，他也已經理解到 1773 年的阿桂領導的金川戰役和西藏的關係密切；參見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51-52。

130 (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22，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庚寅，頁 883a。

法懲治。爾阮患雖僻處廣南於金川之事，諒亦或有見聞；臺灣與廣南海道可通，林爽文之事更當知悉」。¹³¹ 這段語帶威脅的話卻也反映了對於海疆空間的理解；而與臺灣同樣有遠隔海洋特性，不僅是安南，還有英國，如在〈賜暎咭利國王勅書〉中，開宗明義就提到：「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齋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¹³² 換言之，這一次特意取畫贈送的行爲並非偶然，而是臨時決定的刻意爲之。

爲何有此刻意爲之？根據馬世嘉（Matthew Mosca）剖析清英在西藏問題上之接觸，在 1788 年班禪喇嘛向英軍求援，並要求不得向清廷透露此事；英軍拒絕此請，並且不干涉此事，理由是因爲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清廷之間龐大的海上貿易很可能受此事而有未知的潛在影響。不過，第一次的廓藏衝突並非讓北京清廷注意到西藏以南的地理局勢和情報，第二次的戰爭才讓一切浮上檯面。在戰爭初期福康安派往西藏前，1791 年乾隆皇帝就已得知有「紅毛國」位於廓爾喀南方，並要求福康安拉攏之；至於他到底知不知道此紅毛是哪一個紅毛，似乎仍未知。因此，福康安在 1792 年抵達拉薩後，第一次知曉了「披楞」，他至少已得到相當多的消息知道披楞（Fringy，指英屬印度）和廓爾喀間的密切交往，甚至隨後已獲得（姑且不論相信與否）披楞和歐洲有著密切關係。¹³³ 不過除了和珅、松筠等大臣均曾對於英國在歐洲與其他地方的勢力有過詢問，我們也不能忽略這段期間，清廷方面對於海洋事務的探尋；例如斯當東爵士提到馬嘎爾尼曾向清廷建議可以協助中國剿滅海盜。¹³⁴ 這建議與相關探問大概與此前在北京時，葡萄牙、法國傳教士等都曾向官員和朝廷描述英國之強盛以及目標在於擴大海外屬地，乃至於當時清廷曾調查英國在沿海活動的船隻。¹³⁵ 十月一日，乾隆皇帝返回圓明園後，也在瀏覽英方禮品時詳細詢問英國軍艦的功用、能力、造船事業等相關問題。¹³⁶ 根據斯當東的觀察中，發現大清對於：「駐紮在印度的英國陸軍和世界各地海洋的英國海

131（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24，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甲子，頁 926a-926b。

132（清）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己卯，頁 183b-185b。

133 馬世嘉（Matthew W. Mosca），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 216-243。

134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139、141、241、243。

135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82、102。

136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217。

軍力量還是有所顧忌的」。¹³⁷ 馬嘎爾尼通過禮品中的地球儀等隱約賣弄英國航海實力，配合皇帝感興趣的戰船模型，即使皇帝不甚重視除了戰船模型以外之物，但幾乎無處不在馬嘎爾尼使團透露出有關英國為「海上之王」的想法，想必不會絲毫不被察覺。¹³⁸

正如馬世嘉所說，種種線索都讓清廷針對馬嘎爾尼使團和披楞進行連結，但是二者直接關聯要直到使團離開才被完全彰顯。¹³⁹ 實際上，馬嘎爾尼不僅清楚地知曉清軍在包括廓爾喀、安南等地的境外作戰，也知道境內則是近年各省的兵亂。¹⁴⁰ 尤其當官員們開始詢問有關廓爾喀、西藏和駐印英軍問題時，馬嘎爾尼隨即提到的是 1773 年的阿桂領導的金川戰役。¹⁴¹ 換言之，據當時贈畫作為宣揚國威並且高度針對性的手段來說，馬世嘉的觀察無疑提醒我們乾隆皇帝等清朝官員在馬嘎爾尼離華前，對於啖咭利和披楞的關聯尚未進行完全的結合。也就是說，若已知啖咭利和披楞關係，贈送戰圖時當會將和金川戰圖贈送；但事實上，皇帝僅揀選了伊犁回部和臺灣戰圖，此選擇反而僅是針對該國作為海上前來的境外勢力之舉動，加深也證明了當時地緣政治和地理認識的狀況。

因此，從乾隆皇帝對此圖冊的使用，可以清楚知道他想要強調這場戰爭的獨特性是因為發生於臺灣這個遠隔海洋的地點。而這個地點的勝績則有賴於他長期維繫努力下的滿洲族群——即使有許多參加的滿兵明顯不符合他的標準。因此，在這套圖冊中可清楚看到他強調海洋的痕跡以及滿洲軍隊取代原先福康安重視的多元兵種指揮。最後，以馬嘎爾尼使團臨時獲贈臺灣圖的例子，加上乾隆對於英國的海軍力量有所關心和調查，大概可理解臺灣戰圖對於乾隆皇帝而言是一起發生於海疆的戰事，若要將這份功績偉業告知他國自然可以無限制地發送。這份在他監控下完成的圖冊，須達到其目的：驕傲的滿洲軍隊在非內地海疆達成的戰爭以及給予在海疆上活動的國家之「宣告」。

137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290。

138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馬嘎爾尼訪華使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頁 232-233、235-239。

139 馬世嘉，《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頁 334-336。

140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250、301。

141 馬嘎爾尼，《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頁 51-52。

五、結論

《平定臺灣戰圖》從臺灣到乾隆皇帝手中，經過在臺畫匠、福康安、宮廷畫師、乾隆皇帝四階段，在各階段重製中展現不同的面向。這些影響若從微觀而言，各階段均是替主導者服務，但最終所影響的卻不僅是個人，而是一幅如何將帝國放在龐大視野下的產物。福康安所欲強調的功勳和帝國建構中的族群政治有關；宮廷畫家的技法和過去經驗則是全球藝術交流的成果；乾隆皇帝希冀展示帝國偉業樣貌，向外的世界進行宣傳以及向內各地宣傳。¹⁴²

林爽文事件是福康安首次獨挑大樑統帥的戰役。相較於其父兄，福康安雖然年紀輕輕已歷任各地邊疆，但在重視滿洲尚武文化的乾隆朝，他從未領導過足以受到重視之戰爭。福康安出發至臺灣前，乾隆皇帝再三叮囑之、期待並警告他必須擊潰叛黨完成使命。福康安通過《進呈副本》宣揚了自己計略與勇猛，藉此暗示自身的努力；因此，當乾隆皇帝要求起草稿圖時，正是另一次在皇帝眼前展現其個人功績的機會——當然，福康安早在金川戰役與服務於中央時，就已經理解其姑丈乾隆皇帝對於戰後要求編繪《得勝圖》的流程。可謂，編繪《得勝圖》用以紀錄擊敗林爽文一事，對於福康安而言似乎是可預測的。在臺灣，即使施畫者添加自身觀點與印象在畫冊中，16幅圖畫並非僅是這位施畫者所能主導的，對照福康安的奏摺可以發現，圖繪更是強調奏摺內容宣揚個人功績；換言之，在16幅畫同時揭示了福康安希望乾隆皇帝所看到的。

當福康安主導且別有深意的畫作攤開在乾隆皇帝御前，乾隆皇帝會看到何種景象？皇帝會看到「想像」的臺灣生番，也會見到臺灣特有的刺竹林及山川樣貌外，也會瀏覽到福康安英姿颯爽地騎馬居中，領導不同族群建構出來的軍隊平均地在戰場上廝殺與屍首四散的血腥戰場。然而，乾隆皇帝與宮廷畫師們經過二個步驟，將福康安的圖冊改變成另一版本：首先皇帝去脈絡挑選了其中10幅畫，接著由宮廷畫師藉由過去的繪圖經驗與想像，重新畫了揀選的畫作，並且進而製成銅版印刷賞予大吏與諸國。因此，自施畫者、福康安、乾隆皇帝、宮廷畫師一

142 作為宣傳品想必不夠，因此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下旨西域戰圖壓印19份、金川、臺灣、安南戰圖各印20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4，頁359-360。這次補印則是用白露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5，頁266。

脈，這幅圖冊經過了大幅度的修改與變化，以致於後世學者僅能閱覽到最終版本的同時，已經無法理解其原始版本的樣貌與蘊藏的意義；《進呈副本》的發見讓此圖冊的生命歷程和深刻意義體現出來。

最終的圖像在宣揚國威的脈絡下，一場滿洲將士於海疆的勝利被展現於內亞地區，以及馬嘎爾尼使團前。從《進呈副本》變成最終銅版畫版本的過程與當中的取捨，足以佐證馬雅貞所言皇帝希望強調滿洲的尚武文化以及他對於恢復滿洲傳統武勇所進行的努力。以戰爭圖而言，一如邢義田的分析，一幅畫像的寓意可能是多重的；即是，作者在該主題初創作時有其原先的寓意，之後會有所浮動和改變進而變成多重化。¹⁴³ 福康安所繪製的稿本就是有如如此的現象，因為其初衷或許是戰爭圖，但是福康安加入其個人的想法後，該圖像又在北京受到重製與詮釋。因此，從邊疆到清宮、從清宮到贈送，我們不斷地看到想像、意象、理想交織綜橫穿插著。

143 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的構成、類型與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期（2005.9），頁68。

引用資料

傳統文獻

-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清)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清) 李紱，《穆堂初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 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清)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清) 清世宗敕編，《硃批論旨》，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清) 傅恒，《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文十全集》，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清) 慶桂、董誥等奉敕修纂，《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 (清) 薛熙，《練閱火器陣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
- (清) 韓世琦，《撫吳疏草》，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 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清)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譜牒檔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技術部攝影，1983。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1。
- 馬嘎爾尼 (George Macartney)，秦仲蘇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近代論著

-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
-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60卷2期，2009年6月，頁151-180。
-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台南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 李天鳴，〈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年秋季，頁151-194。
- 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25卷2期，2007年冬季，頁139-178。
- 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的構成、類型與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期，2005年9月，頁63-132+226。
- 林世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2期，2006年冬季，頁51-108。
- 林加豐，〈圖史互證：院藏〈清軍圍捕林爽文圖〉與福康安剿捕林爽文之役〉，《故宮學術季刊》，26卷3期，2009年春季，頁105-132。
- 秦曉磊，〈清宮春曉：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故宮學術季刊》，31卷2期，2013年冬季，頁38。
- 馬世嘉 (Matthew W. Mosca)，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 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期，2008年3月，頁259-322。
- 馬雅貞，〈風俗、地方與帝國：《太平歡樂圖》的製作及其對熙皞之象的呈現〉，《中央大學人文學報》，45期，2011年1月，頁141-194。
- 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期，2011年12月，頁49-89。
- 馬雅貞，《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許雪姬，〈由乾隆肅貪看柴大紀案〉，《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年秋季，頁195-226。
- 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乾隆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年9月，頁225-269。
- 陳潘、葉小琴，〈沙濟富察氏與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5卷2期，2016年4月，頁6-11。
- 陳毓沅，〈明清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政大中文學報》，37期，2022年6月，頁5-52。
- 陳韻如，〈時間的形狀——〈清院畫十二月令圖〉〉，《故宮學術季刊》，22卷4期，2005年夏季，頁103-139。

- 陳韻如，〈畫院運作機制對清代宮廷繪畫的形塑與作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1期，2021年9月，頁101-184。
- 陳韻如，〈製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在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故宮學術季刊》，28卷2期，2010年冬季，頁1-64。
- 黃一農，〈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秘〉，《漢學研究》，31卷1期，2013年3月，頁123-160。
- 黃一農，〈明清之際紅夷大砲在東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本4分，2010年12月，頁769-832。
- 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4期，頁3-21
- 葉曉青，〈《四海昇平》——乾隆為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二十一世紀》，105期，2008年2月，頁98-106。
- 鄭維明，〈清《平定臺灣得勝圖》藝術表現特點與歷史背景綜述〉，《文物鑒定與鑒賞》，2019年2期，頁28-31。
- 盧正恒，〈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的繪圖觀點及與銅版《得勝圖》比較〉，《臺灣史研究》，28卷4期，2021年12期，頁41-120。
- 賴毓芝，〈「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故宮學術季刊》，37卷2期，2020年冬季，頁1-56。
-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期，2013年6月，頁1-75。
- 駱愛麗，〈〈愛烏罕四駿圖〉回文題記釋義初探〉，《故宮學術季刊》，30卷4期，2013年夏季，頁207-243。
- 詹鎮鵬，〈帝國紀勳與地方貢品：乾隆朝《平定臺灣得勝圖》雕漆掛屏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5期，2018年9月，頁189-243。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網路資料

- （清）李延基，《清文彙書》（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京都英華堂藏版），早稻田大学図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檢索時間：2023年7月2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工作室，明清檔案百科《六部成語》，<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phrase>，檢索日期：2023年8月15日。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典藏臺灣》，檔案號：RT00042_6，<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2/6d/87.html>。檢索日期：2023年8月15日。

Campaign against Taiwan 1787-1788. Accessed August 4, 2023. <https://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

圖版出處

- 圖 1 福康安額外進呈八幅圖繪中所強調的個人功勳。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枋寮之戰〉、〈大排竹之戰〉、〈獅子頭社之戰〉、〈牛庄之戰〉、〈興化店克捷〉、〈大里杙之戰〉、〈大武壠之戰〉、〈小半天克捷〉，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
- 圖 2 《進呈副本》中各圖福康安與黃色龍旗比較。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
- 圖 3 《平定臺灣圖》銅版畫〈諸羅縣解圍〉、〈斗六門之戰〉與《進呈副本》圖中旗幟比較。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圖》，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平圖 021271、021273；《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
- 圖 4 《進呈副本》與彩繪本、銅版畫之間竹林差異。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平定臺灣圖》，〈諸羅縣解圍〉、〈斗六門克捷〉、〈生擒林爽文〉，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平圖 021271、021273、021277；*Campaign against Taiwan 1787-1788*. Accessed August 4, 2023. <https://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
- 圖 5 《進呈副本》與彩繪本、銅版畫的排陣行軍比較。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平定臺灣圖》，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平圖 021271、021279；*Campaign against Taiwan 1787-1788*. Accessed August 4, 2023. <https://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
- 圖 6 《進呈副本》與彩繪本、銅版畫的火炮比較。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平定臺灣圖》，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平圖 021274、021275；*Campaign against Taiwan 1787-1788*. Accessed August 4, 2023. <https://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
- 圖 7 《皇朝禮器圖式》中炮車分類圖。圖版取自（清）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卷 16，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30。
- 圖 8 《進呈副本》中敵我雙方各種馬匹。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檔案編號 990094520240203941。
- 圖 9 《平定臺灣圖》彩繪本與銅版畫的各種馬匹。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圖》，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平圖 021272-021281；*Campaign against Taiwan 1787-1788*. Accessed August 4, 2023. <https://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
- 圖 10 〈生擒莊大田〉、〈進攻斗六門〉、〈渡海凱旋〉、〈清音閣凱宴〉等彩繪本與銅版畫差異。圖版取自《平定臺灣圖》，國立故宮博物館藏，平圖 021272-021281；*Campaign against Taiwan 1787-1788*. Accessed August 4, 2023. <https://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

Intertwining Imagery, Invention, and Idea: The Making, Reproduction, and Empire-Building of *Pingding Taiwan Deshentu**

Lu, Cheng-heng**

Abstract

Fukanggan hired painters to draft illustrations celebrating the Qing dynasty victory in the pacification of Taiwan for *Pingding Taiwan deshentu jincheng fuben* 平定臺灣得勝圖進呈副本, which were mounted in Beijing and submitted to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1788. The emperor, after a course of discussion, decided which of the painting drafts to be selected, inscribed, and redone. This process has already been studied in detail. However, the present article argues that, after reexamining the original painting drafts, the process of composing these image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s having taken place in three stages. First, Fukanggan, as the lead commander of this war of pacification, was actively eager in wanting to display his contribution and achievement in it. However, wh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ers at the palace redrew the drafts into color paintings and copperplate prints, they then erased the role of Fukanggan in the images. And finally, the artists employed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emperor's instructions to revise the pictures into invented ones.

This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rebellion in Taiwan as having occurred outside that of China Proper. He also craved to display the Manchus' brave and undefeatable capacity as well as territorial seas, which resulted from his construction of the "Manchu identity" ideology. He specially delivered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se illustrations to parts of Inner Asia and designated it as additional gift to be presented to the king of England when the Macartney Embassy visited China. By analyzing the illustrations layer upon layer, this article tries to clarify how the meaning of these war paintings shifted and was changed along the lines of the intention, purpose, and thinking of the different people in charge behind them.

Keywords: Fukanggan, Qing palace, war painting, George Macartney, empire-building, Taiwan

* Received: 13 October 2023; Accepted: 3 May 2024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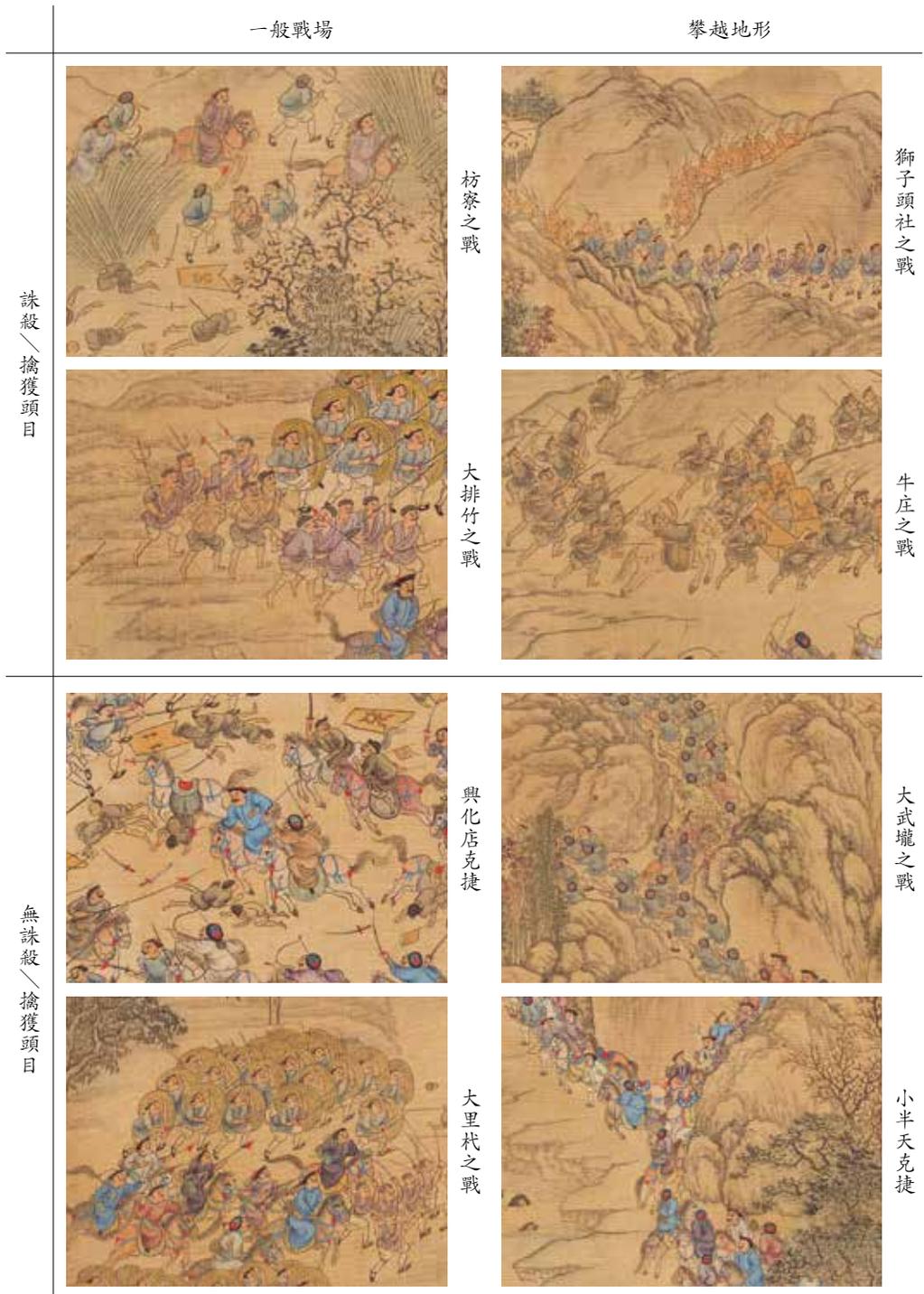


圖 1 福康安額外進呈八幅圖繪中所強調的個人功勳



1. 嘉義縣解圍



5. 水沙連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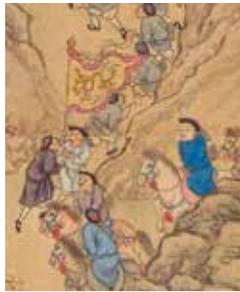
9. 小半天戰役



13. 大武壠戰役



2. 興化店戰役



6. 獅子頭社戰役



10. 擒獲林爽文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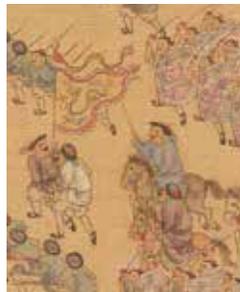
14. 牛庄戰役



3. 大排竹戰役



7. 大里杙戰役



11. 攻佔斗六門



15. 枋寮戰役



4. 大埔林中林大埔尾戰役



8. 集集埔戰役



12. 擒獲林爽文



16. 瑯嶠戰役、擒獲莊大田

圖 2 《進呈副本》中各圖福康安與黃色龍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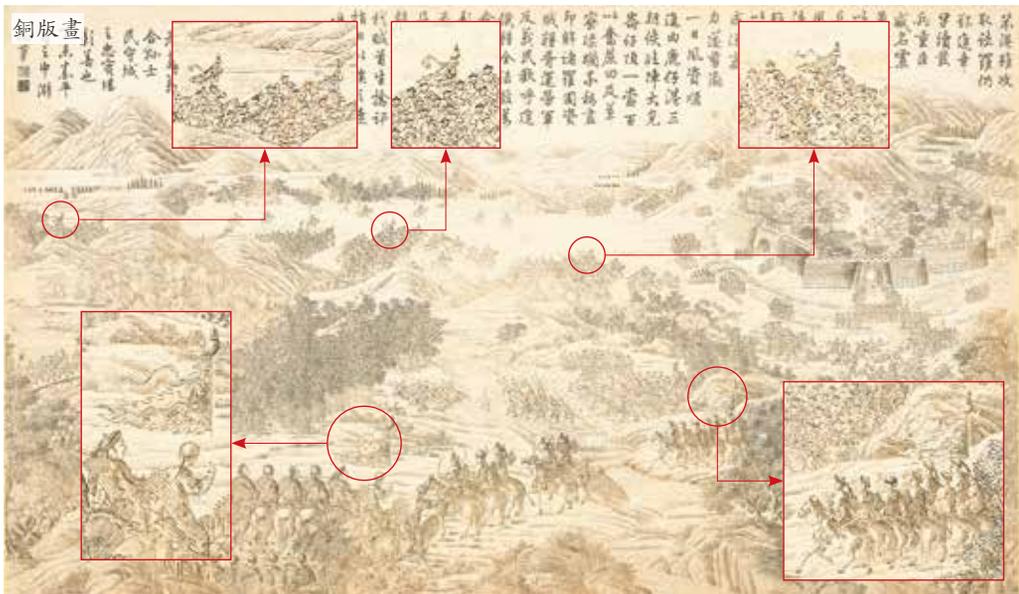


圖 3-1 《平定臺灣圖》銅版畫〈諸羅縣解圍〉、〈斗六門之戰〉與《進呈副本》圖中旗幟比較



圖 3-2 《平定臺灣圖》銅版畫〈諸羅縣解圍〉、〈斗六門之戰〉與《進呈副本》圖中旗幟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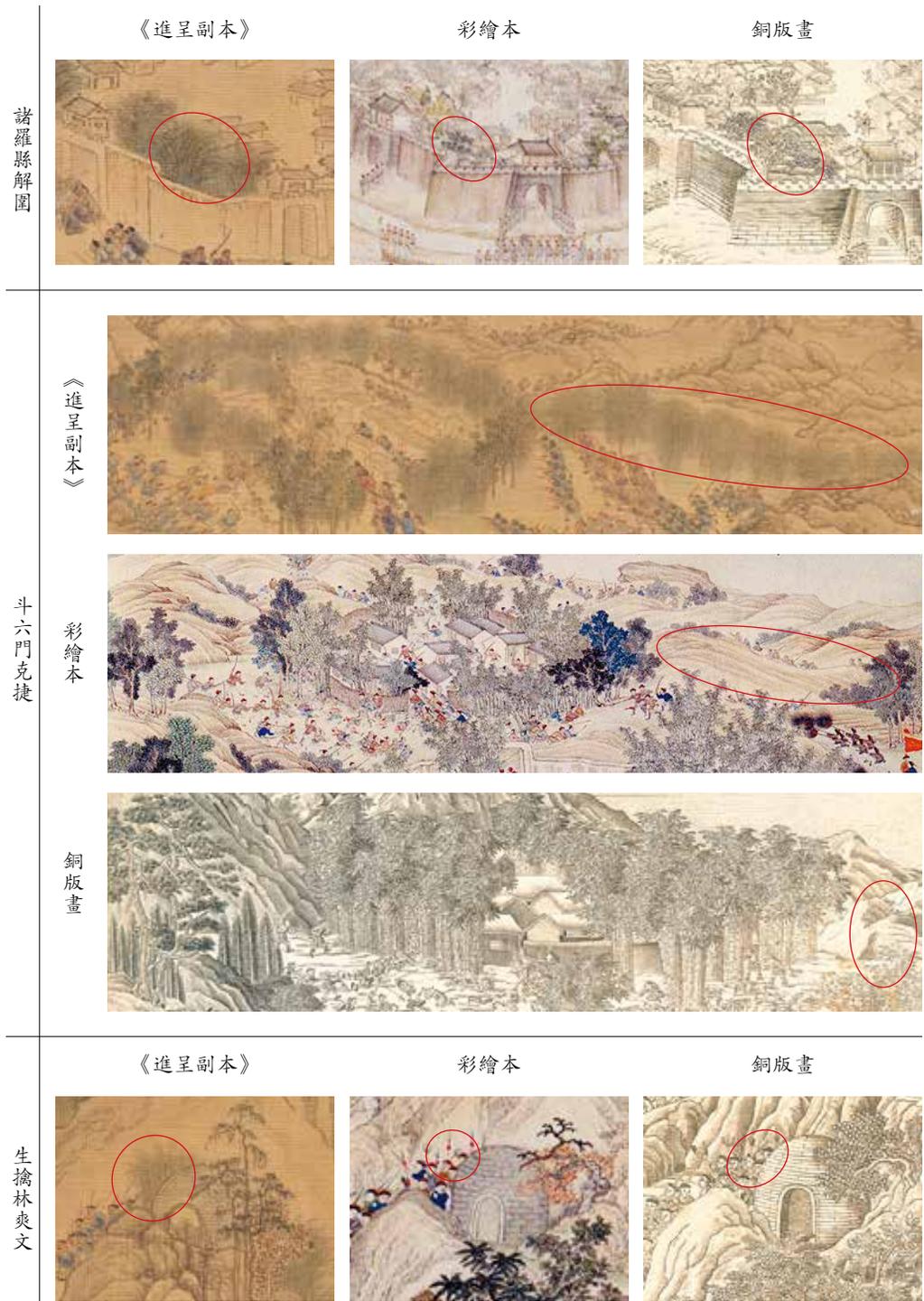


圖 4 《進呈副本》與彩繪本、銅版畫之間竹林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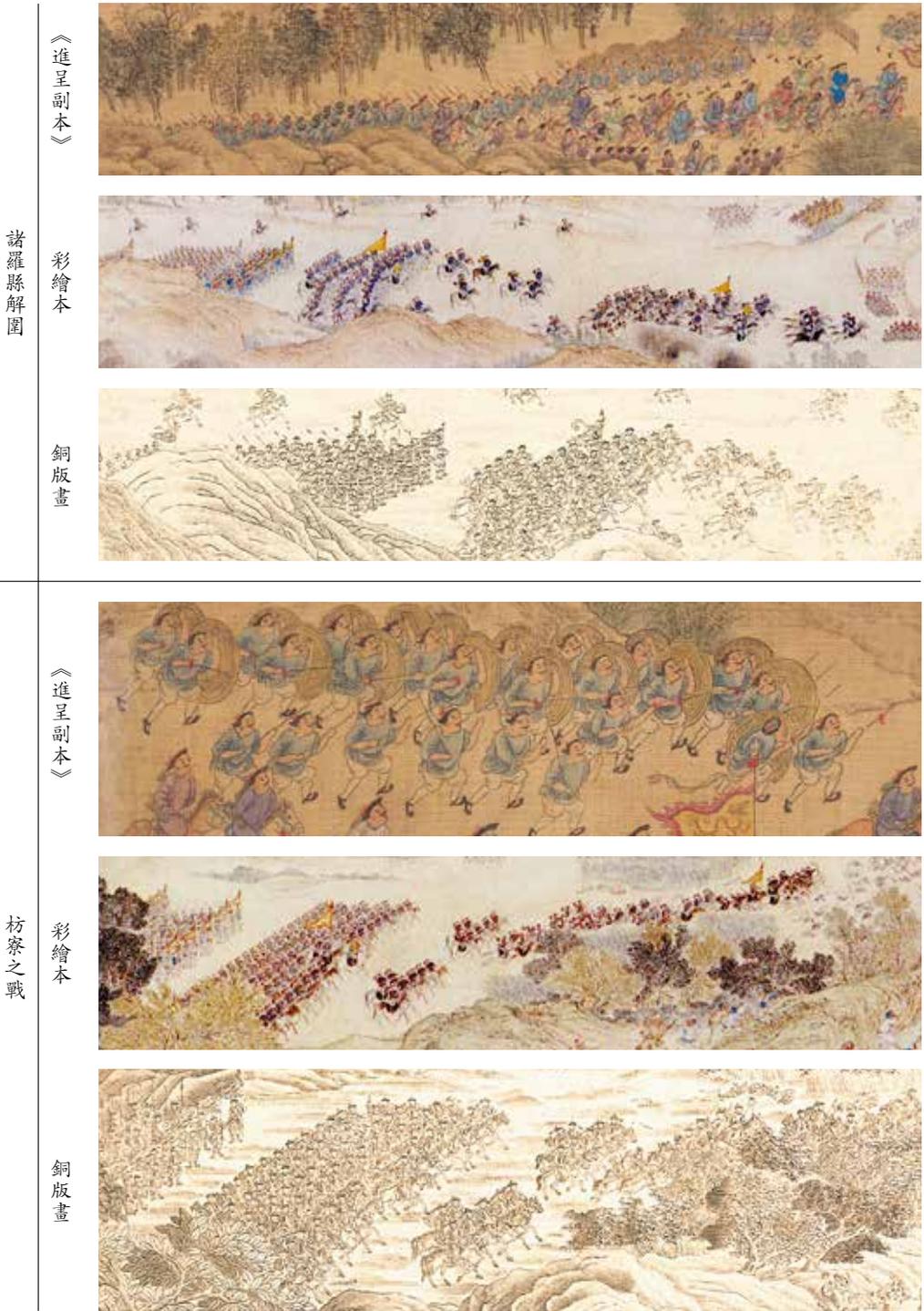


圖 5 《進呈副本》與彩繪本、銅版畫的排陣行軍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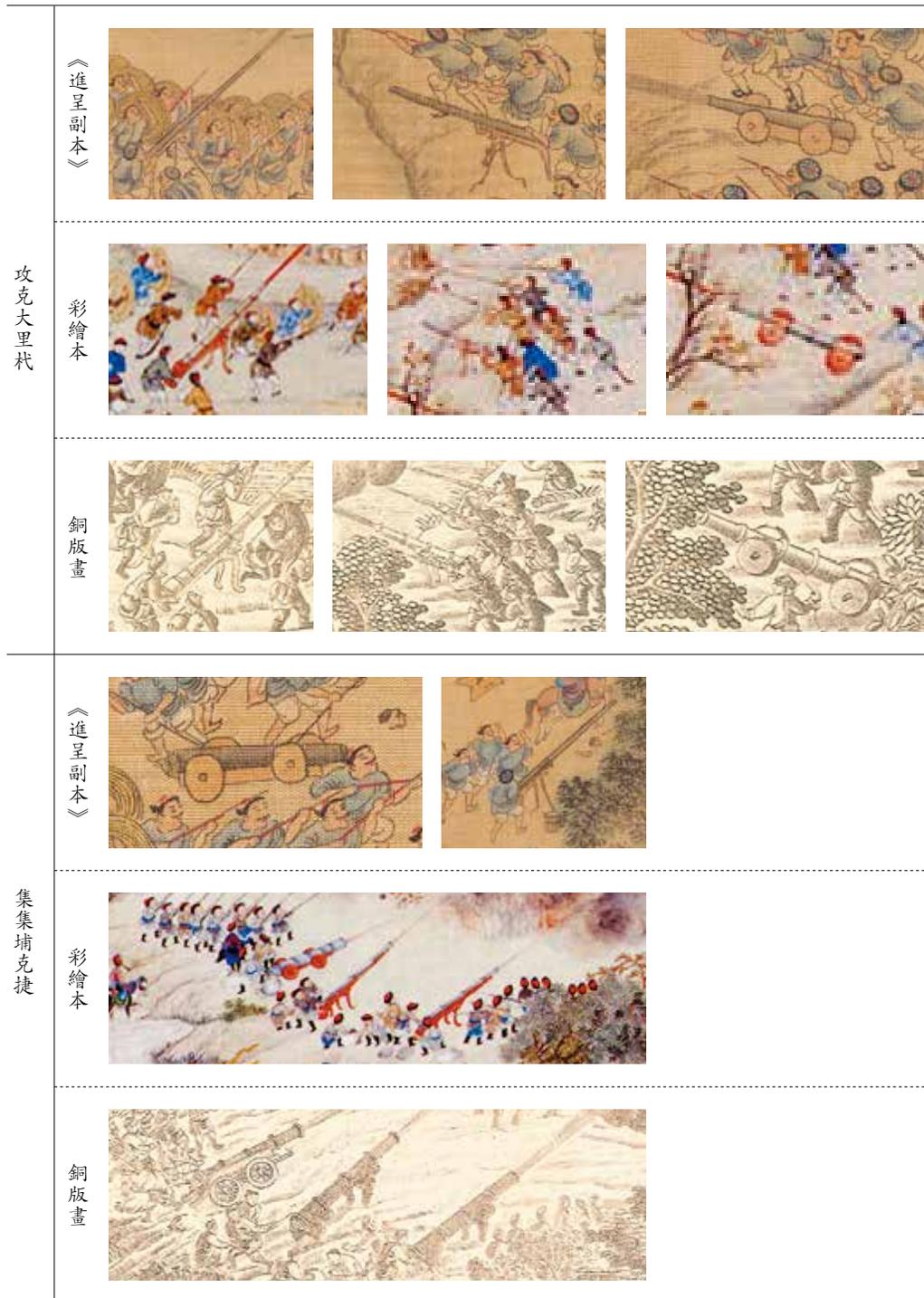


圖 6 《進呈副本》與彩繪本、銅版畫的火炮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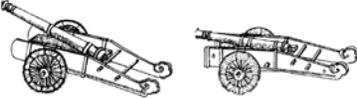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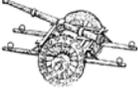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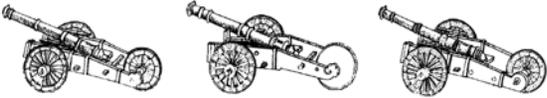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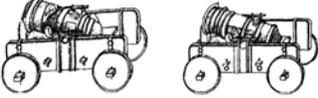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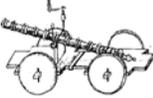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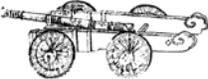
無砲車	
金龍砲車式	
致勝將軍砲車式	
得勝砲車式	
神威無敵大將軍砲車式	
神威大將軍砲車式	
威遠將軍砲車式	
子母砲車式	
九節十成砲車式	
臺灣砲車式	

圖7 《皇朝禮器圖式》中砲車分類圖

滿洲馬匹



叛軍馬匹



圖8 《進呈副本》中敵我雙方各種馬匹

彩繪本



銅版畫



圖9 《平定臺灣得勝圖》彩繪本與銅版畫的各種馬匹



圖 10-1 〈生擒莊大田〉、〈進攻斗六門〉、〈渡海凱旋〉、〈清音閣凱宴〉等彩繪本與銅版畫差異



圖 10-2 《生擒莊大田》、《進攻斗六門》、《渡海凱旋》、《清音閣凱宴》等彩繪本與銅版畫差異